

中国当代景观设计论坛

China's Contemporary Landscape Forum

在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时间段落里,“中国当代景观设计论坛”旨在为读者探寻、剖析中国当代景观设计领域中的热点问题,追本溯源,以清晰、理智的视角审视与梳理景观设计行业十年发展的方方面面。为此,《景观设计学》对行业内各个领域的18位代表人物进行深度访谈,挖掘出了他们对城市化背景下的公共空间问题、房地产浪潮下的居住区环境问题以及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这三大主题的真知灼见。他们或反思、或批判、或呐喊,语言犀利、逻辑缜密。透过他们的思考,我们觅得一个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图景。同时,我们也希冀,这些记录下来的言论能够成为未来中国景观设计的某种催化剂。

城市化背景下的公共空间问题

您认为从上个世纪末到当今的10年中,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具备了怎样的时代特征?城市设计者的关注焦点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李津逵:快、多、大

过去的10年在中国城市历史的“年轮”上,会留下最为清晰地一圈印记,未来的人们将会非常容易地辨认出产生于这个阶段的公共空间。以城市广场为例,其“快、多、大”的特点非常鲜明:

1. 快速建设。这10年是中国城市化加速的10年,也是中国城市建设快速进展的10年。所有的城市广场都是经过“规划——拆迁(征地)——建设”,在短时间人为“制造”出来,而不是经过漫长岁月,通过博弈和调整“生长”出来。他们在形式上带有鲜明的人为痕迹,带有这个时代设计者们趋同的主观意图。

2. 数量众多。10年中,全国几乎每一个建制市、每一个市辖区都出现了新城、城市新区和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在这些新的城市建成区中,几乎无例外地都会在中心位置建设城市广场或街心公园,有些城市会出现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广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10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涌现了一个“广场潮”。未来的人们会发现,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都可以找到建设于这个“世纪之交10年”的城市广场。

3. 体量巨大。由于地方公共治理对政府权力的约束非常不够,城市公共空间往往成为表现“大气魄,大手笔”的场所和舞台。这些广场和同时加宽的道路一起改变了传统城市的肌理。为中国城市创造了千百年来没有的新尺度、新空间。例如重庆江北嘴武汉南岸嘴千百年街区肌理的整体清除,换上超大尺度的演艺场馆。但是过大的空间、过于夸张的尺度,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同时还将千百年形成的场所精神彻底摒弃,在城市的精神空间上演了一场残酷的消灭。它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恶果要待更长远的时间才能品味清楚。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性化、生态化的设计理念开始在各地城市公共空间的营建中体现出来。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设计师不可避免地要受地方主要领导思路的影响;并且,由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公众参与非常不够,很多新城广场是为未来进入城市的人们预设的。因此,这一时期中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现当地人群具体需求的特点非常不明显,摆在哪个城市效果都差不多,也是必然的。

刘滨谊:冲突与融合

特征1:贫富差距拉大;

特征2: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

经历的变化:从满足基本功能的需求到走向更加人性化、环保生态、体现人文艺术。

王向荣:新建城市公共空间无视原来的尺度和肌理

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数量增多了、面积增大了、尺度扩大了、密度增高了,但是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新建的公共空间完全无视城市原来的尺度和肌理,破坏了城市的原有结构和生活气息;有太多太多新建的公共空间是不适合市民生活的旷地,是没有演出的舞台布景。

李建伟:速度快、新东西多、传统符号堆砌

近10年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化建设速度最快的10年。各大城市都在成倍的扩张。比如北京,十几年前才建到三环、四环,现在五环、六环都已经建成。在快速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大家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包括设计师、开发商乃至政府的管理者。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大家边做边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交通。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拥堵现象都非常普遍。在大家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突增的流量使得城市的公共交通负载严重。简单地说城市交通最重要的功能是实现在短时间内的快速通达,但这绝非一个简单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公共空间具备的时代特征很明显,其一是速度快,其二是新东西多,什么新东西都来了,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对待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功能结构和生态生活的复杂关系。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城市的建设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住房需求,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很多的城市功能却是以对地域环境的破坏以及空间结构资源的浪费为代价的。城市发展对生态和土地的破坏就像我们在发展乡镇企业时,造成的对水、空气和动植物的巨大污染一样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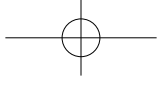
城市公共空间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多人喜欢将传统的文化元素塞到空间里面来突出他们讲文化、讲理念。很多城市的公园里到处都是亭台楼阁、诗词书画。这种体现文化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同时用各种文字符号堆砌出来的所谓文化公共空间也是理念上的一种缺失。公共空间应该充斥着人的活动,充斥着生活本身,而不应该停留在视觉表象,更不要被传统的形式和所谓的素材揉成一团乱麻。文化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清晰的、容易让人读懂的,最终形成一个能够启发人们想象的空间。我们很多人不大会用设计语言去表达感受和主题概念,所以只能借用传统的造园构件和诗画来拼贴了。

刘伯英:景观从某种意义上还是“奢侈品”

近10年当中,中国城市化发展迅猛,城市住宅建设每年5亿平方米,公共建筑7亿平方米,农村住宅6亿平方米。拿北京来说,除了住宅以外,公共建筑主要建设沿着长安街、沿着东二环东三环的CBD、西二环金融街以及奥运中心区,整个城市公共建筑的建设呈现“山”型布局。这么大的建设量,规划和建筑设计一直是受到特别重视的,请国外设计机构设计。而在景观方面,与规划和建筑设计相比,则一直是处于被忽视和不断追赶的状态。一方面,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城市建设者、设计者、使用者对景观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景观建设的投入逐年加大;另一方面,量大面广的城市建设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条件和建设标准,使景观建设很难做到令人100%的满意,在整体上还处于“点到为止”的状态。众所周知,景观从某种意义上还是“奢侈品”,在我们城市建设当前的阶段,在重点城市、重要道路、重要节点、高档社区中才能“重点考虑”,大面上能够“见绿”就可以了,做到全面的精细化是不可能的。

李存东:公共空间成为城市发展的代言者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即城市公共生活在城市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城市设计者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纵观近1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



焦点由10年前的步行商业街到各式各样的城市广场，再到几年前以上海新天地为代表的公共休闲区域，一直发展到现在，由奥运、世博、园博、城运等大型社会活动引发的新一轮城市环境更新。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明显带有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痕迹，也带有不同阶段社会意识形态的痕迹。可以说，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发展的代言者，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乃至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趋向。

马清运：中国的公共空间无形态无定义，讨论毫无意义

公共空间指的是不具备个人的、商业的或个人商业的目标，可以表达民主精神的空间。这其实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时，具有民主诉求的社会讨论产物。我们现在讨论近10年来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时代特征，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中国城市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就不同于西方城市。中国的公共空间基本上处于无形态、无定义的状态，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场所和角落，也可以随时而生。它可以包括我们吃饭桌上、别人屋檐下；也可以是夏天夜，世纪大道上摆了桌麻将桌的、悬着简约晶莹玻璃灯箱的现代公交车棚。这是中国物尽其用、物以我用的都市传统，是极其优秀的空间传统，当然，我们关注到了建筑师对公共空间的刻意塑造并且试图以西方语言讨论公共空间的趋势。

中国的城市空间建设完全没有必要去顺从西方观念，西方因为需要经营民主才产生了所谓的公共空间，而中国的人性是自发的，我们讲究的是“用”，“用”是多种目的的复合。“无体之用”是中国城市的精华所在，只要我们大胆坚持“用”的思想，一切空间都是公共的。但根本目的、基本智慧是保持一切建筑的市民性因素。

张轲：现在是对爆炸式发展反思的最好时候

这10年的城市，不管它是正面负面，确实是巨大的变化，现在是一个很难得的间隙，这个间隙可能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正是对中国城市最近10年飞速爆炸式发展反思的最好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公共空间在过去，至少我回国后的7年里，实际上是一种爆炸性的发展，到现在慢慢的有一种冷却，我不知道这个冷却会不会是真正的、良好意义上的冷却，还是暂时停顿。从城市发展角度来说，我们的规划造成的很多没有用的空间，这些空间实际上是需要我们精耕细作的。精耕细作就是向内扩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进行深度整合，是更多人性化景观设计的一个开始。

规划师也好，景观设计师、建筑师也好，其实很容易做得更好，只是说你有没有梦想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规划师被习惯性的规划动作控制了，永远是苏联规划习惯的四五百米尺度，所以中国城市最像“苏联”的城市。如此大的空间尺度下面是并不集约的土地利用，你可以发现很多土地其实都是空洞的，处处是都市空虚。这就需要景观设计师去弥合、缝合、用更多人的活动去编织这些片断，要让这些空间可使用，让老百姓在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居住感。

朱育帆：中西公共空间历史发展比较

我们可以从较大的时间跨度来看这个问题。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历史较为悠久（至少从实物意义的史料而言是这样），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文化及其相应的发展模式，这种现代空间是从自己的文化中脱生而出的。

西方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困惑主要集中在设计上，他们较多的受牵连于古典样式的束缚，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后期，现代主义设计才开始逐渐的进入主要视野，并在二战后产生新的城市活力。

相对于西方，中国在这方面就比较尴尬了，从史料上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祖先的公共空间塑造能力，但由于实物和文献遗存的局限，中国在公共空间处理上的文脉是断裂的，这样使得中国自己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一度主要是从苏州园林、扬州园林等私家园林中吸取养分，但公共空间不等同于私家花园，一般是不能直接转化应用的，于是就照搬西方的模式而

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这是个两难命题。

因此，要重新梳理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空间还是得从中国古代的公共空间研究出发，而不是直接的照抄利用传统的私家园林设计手法。但是历史上的公共空间随着朝代的更迭遗留保存的很少，也没有太多的图像资料。在近几个世纪，中国的传统空间格局又受到殖民者的冲击，原生的更少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困惑。

陈跃中：市场化是景观设计行业十年中最大的变化

其实在中国景观设计很早就有了，叫园林设计。1998年~2008年这10年我们开始把它叫做景观设计，它主要的变化是从围墙里走到围墙外。原来的园林设计是在围墙里面造一些园子。近10年有几个大的变化。

第一，中国的景观设计师开始关注城市尺度下的空间营造，形成开放式的城市景观。原来他在围墙里面做园林，你进了颐和园才有景观，出了围墙就不叫景观而叫城市了。现在，城市和园结合成一体了。

第二，我在这10年一直提倡的一个理念叫“大景观”，简单说就是景观师来做规划。所谓“大景观”，是在城市设计层面上，以景观规划设计师为主导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将景观设计纳入场地前期的整体规划。在景观规划设计师确立总体布局、道路组织、地形环境、场地竖向标高的条件下，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相互配合进行设计。这与国内传统的由建筑师先行布局建筑位置等，景观师而后填空的设计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它绝对是对传统建筑设计工作序列的一种颠覆性修改。景观师应该成为“区域规划中景观生态规划的制定者；城市规划中综合规划决策的参与者；城市设计中场地环境营建的领导者”。

第三，教育上有所突破。实际上，建筑还有其他的一些工程、水利等等都进入到景观教育的教学里面。以前景观设计更偏重的是构图、植物的研究，现在更多地引入建筑的研究、工程、交通等等。景观设计越来越是一门科学了，它不完全是个美学问题。这也是在这10年里面发生变化的。

第四，由于中国城市化速度非常快，就需要景观设计这个行业有一个迅猛的发展，所以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本身也成为一大景观了。很多学校都开设了这个专业。另外，很多事务所都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这也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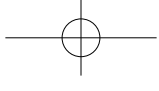
最后在城市公共空间发展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包括中国经济政策的崛起，中国城市公共空间这个分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项目非常多，投资量也非常大。甲方主要是政府，主要是以公益为目的，提升城市形象，为大城市社区居民服务，展示城市性，展示文化。城市广场等城市空间，发展到目前，逐渐走向成熟。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或者你要看成设计问题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目前这个社会形态、政治体制在行业里的反映，比较多地注重外在的形象、集会功能、气派。反映出目前政府权力的集中。

整个行业基本上在这10年，是一个形成的过程。10年之前虽然这个行业不叫景观设计，但是它存在，比方说园林设计。但是在10年前这些人不是市场化状态。这10年发生最大变化就是这个行业走向了市场化，这就是他们对这个行业最大的贡献。所以我觉得，从园林设计变成景观设计，最本质上的变化是这个行业变得市场化了，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行业本质发生变化，而是用国际化的语言包装了它。

王辉：人口的城市化和城市的城市化

我觉得这10年是中国城市化成就最显赫的10年。因为无论从数量、规模还是每一个城市的质量方面来看，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10年里中国城市的成长增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大得多，这已经是一个共识。

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本身的城市化，另一个是城市自身的城市化。10年里，中国城市逐渐从生产型城市转换为消费型、资金型城市，这是最显著性变化，在城市里做什么事情都是商品的消



费。过去的城市是对立于农村的，是工业对立于农业的形态。现在的城市是服务业对立于生产性的第一、二产业的状态。同时，中国工业也产生了新的转型，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搞工业外迁，工业区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城市形态。中国相对廉价的产业，也都开始移植到国外。城市是公共空间的生存土壤，理解了中国城市的这个本质性变化，才能较好地解答关于城市化的问题，进行城市设计实践活动。

景观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切片，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表现城市活力的手段，也最容易体现政治力量。在政府5年一届的任期内，一些宏大建筑项目不见得能完成，但是城市美化和景观很容易实现。10年里，景观设计作为地方政府表现业绩的一种手段，已经越来越有效。

俞孔坚：城市美化和化妆的时代

中国的城市设计是从上个世纪的1999年云南世博会开始，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开始把城市建设推向一个个高潮，这和美国比较像，美国的城市设计也是从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开始。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伴随着中国城市财富的巨大膨胀，城市快速地、极度地膨胀。而这个财富的膨胀是房地产开发、土地价值释放造成的。土地的财富迅速释放以后，城市决策者手中大量的钱，最大的出路就是想搞城市的美化。但是由于中国这个时代的文化教育准备不足，以及专业准备不足，特别是它没有经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这个阶段，使得城市化变成一个纯粹的带有很强旧意识的一种城市化妆。这种旧意识实际上体现为封建集权意识、长官意志。城市是公共的，但城市建设变成一个人权力主导下的行为，这是带有很浓的封建时代特征的。所以第一有钱，第二文化品位没跟上，第三我们的权力还是封建时代的权力，这3个特征决定城市开放空间这时候最大的特征就是城市美化和化妆运动。

第二个问题我的理解就是找出这10年城市化进程中的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改造，就是拆破烂。拆了干什么？修宽马路、建大广场、铺大草坪。第二个是治理，比如城市街道的灯光设施量化工程和所谓的河道治理。第三个是经营，通过城市事件来拉动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城市规划与设计、开放空间的建造都是城市经营创造城市事件的手段。

庞伟：真正进步取决于权力结构的改变

多数新建的城市空间仍然是恶劣的，没心没肺，谈不上什么关怀、意义、创造。从物质到意识充斥着粗糙和乏味，“七分主人三分匠”。这个领域的真正进步取决于权力结构的改变，设计师只是次要的一方。

马晓晔：正在转变

我从个人的观察来看，中国10年以前非常注重城市外观整体形象，10年后的今天是比较内在的，尤其是以景观为着力点的方向变化着。以绿地为例，以前，我们比较注重“看上去”的感觉，现在正在发生转变，关注“绿地到底是为谁服务、给谁设计的”，同时以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为主体，关注人的具体的行为。但是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对人具体行为的关注只是个开始，远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比如，我出去锻炼，只能在马路边上，还经常被自行车打扰，闻着汽车的尾气，听着噪音，在一个非常不愉悦的环境下去锻炼身体，这是矛盾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城市空间的浮躁，对人的关注还是不足。

吕斌：对现代景观设计的认识源于三种理念与背景

总体来说，我觉得景观问题和景观规划设计问题，其实是我们广义的所谓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里面很重要的问题、很重要的领域。“景观”这个概念，包括“景观设计”这个概念，其实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概念，或者说产生这种专业，我觉得还是与工业化的背景有关系，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人们的生活环境、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在处理自己的居住或者工作地点和周围环境的时候，自然就会有在另外一个维度上

来考虑我们人工的环境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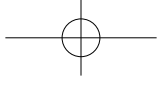
100多年来，在景观领域，有一些特别执着的、优秀的学者和设计师，引领了这个领域发展到今天。我们回顾100多年，特别是20世纪整个100年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代人塑造了景观，还是景观影响了我们？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两者都有。景观本身，即特定的地域、国家、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包括传统、民俗等广义的景观和总体的效果，对我们一代代人的影响很大。景观的变化，其中我承认有景观设计师、城市规划师、设计师和建筑师、园林师的贡献，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技术，包括整个气候，大的环境变化，特别是工业化的结果，我们很多技术，包括一些价值观的改变，渗透到了城乡的空间形态、物质形态和所谓的景观形态中去了。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对景观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人在地球上，在大自然面前，还有他很脆弱的一面。地理学家考虑人地关系的一些思维方法，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景观设计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他们的视野和深度逐渐在发生变化。

今天我们回顾近10年景观设计的进展，无论是对我们中国，还是对西方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最近10年或者近20年，我们对景观的认识，在设计中的很多价值取向和某些手法所发生的变化源于3个原因。第一，是上个世纪90年代麦克哈格提出了“设计顺从自然”。也就是将所谓的生态学的思维、理论、实践的手法，很好地导入了景观设计。这对于整个景观设计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变革，具有革命性的影响。生态学的思维、理论跟设计结合起来，这很有效。一些很执着的学者，包括俞孔坚教授，都坚持这种观点，我觉得都是传承了这种理念。第二，是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就是重新来评价历史、文化等方面如何在现代中进行融合，评价新与旧的关系，还有很多其他方面。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这种后现代主义在建筑、规划、景观等领域里面影响越来越大。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遗产、我们的历史文化。它对我们十几年的景观设计影响也很大。比如在谈到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建筑遗址等问题的时候，大众基本上都能接受。幸运的是，回顾中国景观设计的10年，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是没有去重复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现在已经是后工业化的国家当年工业化初期走过的那些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生态学的概念，有了后现代主义以人为本的这种理念了。第三，国际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它加快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动速度，使障碍减少很多。国内外的交流、传递是必然的，但早先传递进来以后，它跟我们本土的文化要进行磨合、融合。而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磨合、融合所需要的时间则大大缩短了，它很快就“落地”了。“落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磨合、本土化的过程。现在这个过程时间很短，所以问题比较突出。其实西方也有同样的问题。欧美国家最近一些年地域性差异也在减小、淡化。我觉得这10年，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应该说跟国外相比，没有落后之说。

王澍：老百姓卷入一场表面的、夸张的幻象之中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普遍地都有非常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或者说好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肌理，随着房地产开发和城市的商业化开发，城市空间出现普遍地郊区化的过程。

以往的城市是由人们的生活很贴近的、密集的、小尺度的公共空间群构成的体系为主体，而新开楼盘加上所谓的大型城市公共空间，使得“集中的城市空间”出现。真正和人相联系的多层次居住空间基本消失。这种状况其实跟道路系统的变化很相似，宽大的交通道路，包括大量的房地产商业空间加上集中公共空间的做法，普遍地发生在中国城市的中心地带，所以就叫“城市中心全面郊区化”。它不是普遍意义上城市化的过程，我说它是郊区化的过程，因为，欧美城市的郊区，基本上呈现了这样状况。如果我们把和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尺度的城市空间认定为是好城市的一种象征的话，我们可以说现今的这种城市化是在城市化的旗号之下，实施的一个反城市的开发过程。



现在是大城市发生这种情况比较多。像我们的浙江，浙江现在基本都变成这个样子，甚至在镇上都开始发生这样的变化。有人叫它“传统结构模式崩溃”，我觉得是“好的城市结构全面崩溃”。它是急功近利的商业地产开发的结果，再加上政治性力量，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情形。

那为什么说传统的是好的呢？好的城市和不好的城市，相比之下，我认为传统的城市更接近于好城市的标准。现在是好城市在向不好城市发展。这种直接牵扯到城市空间的变化其实受社会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对社会的变化有影响。因为邻里和社区是靠城市公共场所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空间的消失，也就意味着邻里社区的瓦解。可以说，现代的城市追求表面上的排场的同时，人性也在流失。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个别的，它具有全面性、普遍性，这是系统性的问题，是大家对“什么是美好的生活”的认识出了问题。大家为了梦想被一些非常表面的、夸张的现象所迷惑。这个问题出的时间长了以后，才会觉得苦不堪言。这是现在碰到的比较大的问题，不光是建设者、开发商，连老百姓都卷入这样的一种幻象之中。

作为设计者的话，只能是发挥他该发挥的作用，说出该说的话。但是这个作用只是一个作用，在社会发展里头设计者起的作用有限。这10年里，要讲最积极的一面，可能还是有少数的设计者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有一些局部的探索。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包括建筑语言向现代的转化，这方面是有一些结果出来，但是我觉得，整体上，设计界是缺乏真正批判性的眼光和前瞻性的。基本的局面，实际上还是对西方比较时髦东西的模仿，以前觉得条件不够时不能实现，现在比较大量的实现了，但实现之后出现了价值观的空虚，实现又能怎么样？还是模仿。用别人的东西来阐述自己的生活，这是有问题的。

乔全生：从表象到具有渗透力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从几乎没有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城市结构过渡到开始意识开放空间的重要性。公共开放空间的发展过程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从表象的美化工程逐渐转换为一个更具有渗透力的空间，这里的“渗透力”是指生活上的渗透力、社会文化的渗透力和经济渗透力。所谓“表象”，是大家所说的形象工程。早期的绿化事实上并不能够为所谓人的尺度提供更多服务机能和内容。早期在北京，很多人在立交桥的绿化带里面放风筝。这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是一个比较荒谬的现象。

人对公共空间的需求随着社会的改变也在改变。现在许多小区空间绿化、人行道美化，步行街都出现了。城市广场也从一个纪念性的广场逐步转化；譬如说大连市政府前面那种纪念性的、非人性尺度的广场，到许许多多的城市中人性尺度的、亲切的广场，像宁波的天一广场。这种逐渐渗透到生活中的转变，不仅是政治上的任务，而是生活上的、文化上的、消费娱乐上的需求。再次强调，城市公共空间要渗透到整个城市的结构和市民的生活中。

这些年来城市公共空间的转变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是城市空间意义的演变。从一种绿化、一种表象、一种形象工程、或者是一种政治任务，演变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提供市民生活的空间与环境，或者是代表城市风格的一个场所。

作为城市设计者，关注的焦点从怎样来创造一个形象、一个宏伟宣言，到怎样以更可持续的方式表达城市的真实风貌。城市形象与城市风貌是两回事。形象是一种宣言，是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形象。而城市的风貌则是体现了怎样利用空间设计为使用者提供更多的价值，使用者可以与场地发生更为密切的关系，应从社会、经济、生态和文化的角度来诠释。

您认为应该怎样建立城市公共空间的认同感与参与感？

李建伟：公共空间为公众所用

所谓公共空间就是要为公众所用，目的非常明确。

首先，具备实用性。符合使用者的需要，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使用要求来布置空间环境及景观小品。

其次，具备生态性。不管公共空间里包含多少植物或是水体，或者说还

包含有其他生物性的东西，都必须符合生态环境的要求，比如说采光、通风等等。生态对于城市公共空间来说尤为重要。

再次，就是系统性。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城市空间都是独立设计的，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实现完整、全面、系统的规划。并且每一个开发项目之间都没有联系，相互之间不能形成一个整体。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将公共空间、生态系统和交通系统等等理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这样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才不会有意识无意地把那些最重要的东西践踏了。如果不意识的保护某一水系，那么它很可能慢慢地就会断流，或者被填掉。若不把河流、溪流、湿地有意识地串联起来，确保它们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它们则可能有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消失，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实现系统性不仅是设计师，同时也是城市管理者的责任。作为城市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有组织也有能力维护好城市的管理运营。首先，要有一个完整的规划，然后要有一个能实现这个规划的管理机构和团队。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应该建立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规划。这个系统不仅仅包括绿地系统、交通系统，还应该是一个整体的公共系统。这个系统的生态跟交通、娱乐、以及所有的城市户外活动都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而大多数的城市规划师没有透彻地学习过所谓的生态系统。整个社会需要有理解生态和懂得自然及社会资源的人来做城市规划。每个城市的规划只有基于当地的山地、水系和植被资源，这个城市才会有依托，否则就相当于在沙漠上建城市。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城市都是这么建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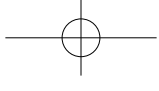
李津逵：表达现实交往需要和公民社会意愿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能够从这种角度看待城市公共空间塑造非常可贵。有学者指出：“空间的重组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的时候，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场所”（包亚明，《都市与文化译丛》总序）。中国的城市居民数量正在迅速地扩张，原有的城市社会经过旧改和拆迁正在迅速瓦解。因此，城市公共空间并不是表达现实交往需要和公民社会意愿的场所，他们的“参与感”相当少。大量城市公共空间正塑造着新的城市认同，这种认同的背后充满了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想象。这状况是我们社会发展所处的加速城市化阶段决定的。的确，建立高度认同感与参与感的市民社会也许开始起步了，但是大大滞后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建造速度。只有等到未来，让我们的高度认同感与参与感的市民社会去评判我们这个时代留给他们的遗产。

陈跃中：反映社会最新诉求

城市公共空间，从来就是景观设计学里面的前沿设计思路的一个舞台，它是实验品。最前沿的一些东西一定是在公共广场、公共空间上进行展示。所以它更多地结合当代艺术，景观类科学的最新动态也会在城市公共空间上有所反映，包括一些城市工业遗迹的保护。这10年以来，景观设计学上这种新的观念和新的手法，都会在城市公共空间这个门类里面得以展示。它实际上是一个新思路、新手法展示的舞台。这基本上反映出景观设计的脉络。

如现在比较新的、反映社会最新诉求的生态设计，应在公共空间、公共广场里实现，比方说对乡土树种的运用，节水、节能的一些设计。当然，它可以放在居住区里面做，但是展示性就弱多了，对于行业的领导力就弱多了。政府对于他的施政理念，对于稳定、和谐等一些政治宣言的诉求，也会在公共空间反映。比方说政府所追求的公益性文化，如通州文化广场，它反映出我们在发展很快的现代社会里，应该反过头看看我们古老的运河文化，保护运河文化是政府的责任，它必须反映当地的文化根源。我们所做的通州运河城市段就用现代语言诠释了古代的运河文化。类似这种，都是由市政府主导，反映最先进的设计理念、文化理念、政治理念。美国就与中国不同，它的政府广场很可能是最不起眼的地方，但是整洁，完全向市民开放，一般来说规模也很小。



庞伟：公共产品公共化

公共产品如何公共化是问题的关键。公共产品不能被置换成领导意志的载体；同样，设计师要成为“公共”的言说者和再创造者，要聆听和对话地方知识，要学习并尊重人们真实的、活着的文化和生存状态。

张轲：公共空间是给人用的，而不是给人看的

全世界的老百姓，中国老百姓最容易接受新的东西。因为之前我们老百姓是没有，现在只要你有，就已经很高兴了，舒服不舒服，这都是次要的事。所以我觉得中国景观设计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奢侈的设计环境中工作。你给他什么只要能，他都能接受，所以认同很容易达到，关键是参与感。我观察了很多公共空间的使用，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是使用这些空间的人实际是流动人口。比如我们在上海做的疯狂小三角，最常看见的是民工在里面，有自己读书的、有谈恋爱的，因为他们除了很狭窄的宿舍以外，就只有在街上的活动。所以他们可能最先发现可以坐卧停留的地方。他们的需求应是我们更需要关心的。

而在这个方面北京做得不好，大多数道路从尺度到设施都是不可以停留的。当然这和我们的政府观念有关系，面子工程当然就是让人看的，至于老百姓怎么用，喜不喜欢用对他们来说不是特别重要。其实道路应该是中国最主要的公共空间类型，因为我们的路都很宽，然后就是路两边、过街天桥，都属于公共空间，人的流动和密度都很大。但道路公共空间对于路人来说却是最不人性。所以政府应该多做一些并不是简单在面子上，而是老百姓大家都能够称道的、很乐意使用的公共空间，这对政府的帮助会更大。因为现在政府和市民的和谐关系越来越重要。

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是很难，比如明城墙遗址项目，如果你不想在城墙脚下给它提供一个公共聚会空间，可能它就不存在，可能就是一片草地，大家不能在上面踩。但是你提供一个东西，老百姓自己会很创造性地去使用它。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是一两个设计师能够达到的，是一个群众的集体创作。所以我觉得，公共空间哪怕分给老百姓维护，都可以维护得挺好。

王辉：让城市景观可游、可居，而不只是览胜

我们现在谈促进参与已经不新鲜了。参与本质问题是平等，只有平等，才有可能参与。西方对中国城市空间的一个强烈的批判就是说中国城市是内封闭式的社区。在内封闭社区里，城市资源只被少数居民占有，其他人分享不到。虽然封闭式社区内部的绿化景观都做得很好，但在城市景观上却没有投入，因而城市公共空间看起来很差。因此，对中国而言，让很多没法参与封闭式社区享受的人能够参与使用城市公共空间，就是城市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的意义所在。

城市景观的本质目标是使得城市让人可游、可居，而不只是览胜。设计师应该从意识形态上开始改变，把城市景观设计从单纯的绿化、美化、追求视觉效果，转移到设计满足公众参与性的空间这一目标上来。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满足城市景观的可达性。举个简单的例子，北京城市环路周围有相当大面积的城市绿地，却被快速机动车道隔断了，几乎不能跟周围的社区、人群产生关联。与其如此，还不如把这些绿地改造成可用的城市公共空间，结合停车场设计，也有一种实用性。这要求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有端正的意识，即公共绿地是一个可达的绿地、可用的绿地，而不只是可看的绿地。

现在景观设计对于绝大部分设计师而言，依然只是一个平面设计、静止的设计或者说是景观产品的设计。人如何变成这个画布中的一员呢？如果更多地设计群众的活动场所，把人的活动放进画面，那么可能会少做很多无意义的景观设计。

在中国有意思的是，景观设计可以调动大量的人作为场景的一部分。比如一个居住区的景观设计，设计一堆人玩太极、一堆人扭秧歌，一堆人跳舞等等，这是在每天的某个时刻会不断重演的活动，活动本身能产生的一个壮观的场面，将是很好的瞬时景观。

马清运：只要走到人群当中去或吸引人群走过来

市民社会同其空间之间没有必须的联系，市民社会的精髓在于超越家庭，次于政体的社会构成结构，家族行会等等，它不同于新公共空间的意图，中国传统的都市经验其实具有非常好的市民性，只要走到人群当中去或吸引人群走过来，便能达到目的。

李存东：积极的公众参与

以往城市公共空间的产生，大多是自上而下的结果，主要由政府决策和商业市场运作产生，这就难免产生一厢情愿的倾向。大多数城市公共空间建成后市民只能被动适应，尽管不乏优秀的实例，但市民的认同感和参与感不能主动体现出来，于是产生了很多投资浪费的现象和不受欢迎的城市消极空间。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的持续，我认为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决策机制和评价体系，应引入公众参与的成分，从而使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更具人性化特征。

刘伯英：建立社会交往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的服务对象是市民，是经常使用公共空间的普通老百姓，所以要实现以上的目的，必须研究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行为特征等。在这个基础上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设计，才能达到认同感。中国传统公共空间沿着院落——街巷——市集——郊野，从小到大的空间层次；参与公共空间交流的人员从家庭——邻里——社区——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到达公共空间的距离由近到远；这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而在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社会生活高度开放，精神思想高度解放，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需求是通过景观建设实现公共空间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高度结合和统一，这成为对景观建设的最高要求。我国城市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先后出现了“广场”“公园”“步行商业街”的热潮，一方面说明城市功能的需要、人们社会功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实现高度认同感与参与感的市民社会，体现“和谐社会”的社会目标。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学习型社会”、“知识型社会”的建设，社会交往空间的建立始终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刘滨谊：满足认同感的多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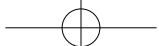
我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塑造的主要目的是为市民建立平等享受公共空间资源、满足户外活动的基​​本生活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矛盾，而不是建立高度认同感和参与性。集中统一的高度认同感基本属于政治考虑而非人性的本体需求。人们在户外公共空间中的参与活动是丰富多样的，高度的参与性取决于公共空间的多样性以及多样不同的认同感。

马晓晖：必要的争鸣

现在有一些专家在呼吁，政府部门也在主动地关心这一点。我觉得政府还是非常诚心地想把城市建设好，他们很虚心，也很勤奋。但我们现在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城市的面貌还是非常依赖最大的领导者。它跟西方差别很大，西方有大量东西并不是政府主导，而是由专业群体和设计师来在社会上进行强烈的呼吁，提高公众对问题的认识。所以，现在我们专业群体发挥的力量还是有点弱，声音比较分散。即便是专业人士的意见，也比较杂乱。最后可能就会互相消弭对方的作用。公众得到了这种混杂声音，也不知道怎么来衡量和评价。这种情况下，公众也无从参与，他们的意见也没办法被具体地采纳，只能谈一些空洞的感受。所以这个专业本身的量化，包括专业意见的集中，或者是价值观的集中，非常重要。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中国有什么方法可以借鉴，从而达到从争鸣到统一？

我觉得有难度。因为中国毕竟有中国的特色，文化传统非常深厚。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追求一个声音不太现实。不管是政府出面，还是个人出面，来把它统一或一体化，我觉得既不可行，同时也不符合自然规律。应该允许它有一个争鸣的过程，有一个淘汰、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



持续20、30年也不是很可怕。因为美国也是发展过百年了嘛，过了百年才逐渐积淀下一个完善的体制，我们不太可能用10年达到别人100年的效果，这不现实。

从设计者的角度，关注焦点的变化可以看到，今天做的很多东西，10年以前可能连这个词汇都不存在。比方说“养护”这两个字，5年、10年以前，大家认为景观是一个无限求繁的过程，用中国传统园林的私家庭院尺度下的密集度，看待任何东西，都是用一个固定的眼光，来套用到所有的东西上去，它有一个固定的审美。现在，我觉得至少审美观多元化起来了，但多元得还远远不够。景观，正在变为具有不同的尺度、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定位、不同的功效的景观。10年以前我们无法想象鸟巢能够被接受，它能够被盖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现在景观界大量的作品，10年以前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我认为人的价值观，是在经历着一个多元的变化，它为我们打开了很多扇门。

王向荣：不能将用地的性质单一化

首先，要消除目前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将土地划成方块、再将每块土地的性质单一化的普遍规划方法。城市的功能不能单一化、每块地块的性质也不要单一化，这样城市公共空间才能深入市民的生活，这是一个积极的城市公共空间存在的前提。其他诸如可达性、人性化、使用、空间和尺度等问题，对于一个好的设计师来说都容易解决。

乔全生：充分理解场地特色、当地文化和开放空间的任務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每一座城市有着独特的风貌。从城市角度出发，每一个区域的公共空间都应该有它自己的特色。在设计城市开放空间和公共空间时，可以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进行发挥。这些资源除了所谓的场地特色之外，更多的是呼应当地的文化或是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举个例子，在成都设计生活空间或城市的空间与在江苏或是苏州创造一个公共空间是不一样的。这不仅是天气、场所或是场地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使用者生活方式的差别。

另外，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任务。一些小尺度的空间可以提供邻里活动，还有大尺度的空间提供城市的开放空间。所以设计师应该更多地去理解场地特色、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必须理解开放空间的任務，然后才能将认同感和参与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俞孔坚：天地人神的齐备

认同感和参与感概括起来就是归属感，要让人感觉这个城市有归属感，首先要让这个城市给人一个方位感。它应该有清晰的结构，有方位，有记忆，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坐标。这可以用天地人神来说，天地就是有方位感，比如说一颗大树可以建立人跟天地的关系。钟楼、鼓楼就是城市的坐标。坐标应该有恒久性、延续性、历史性。在当代城市建设中，我们失去了这个坐标，参照系破坏了，就失去了归属感。古树没有了、河流没有了、山的关系没有了、街区也没有了、人跟城市的关系也就没有了。物质空间坐标关系的丧失是跟拆相关的，那城市不可以拆？可以拆，但是坐标关系不能拆。其次，人跟人的关系也要坐标，四世同堂、兄弟姐妹是一个坐标关系。一旦这个坐标失去，人也没有归属感，也不知道归谁了。邻里关系是一个坐标，老邻居拆没了、小时候伙伴拆没了，就没有留恋的地方和人了。城市空间的破坏不光破坏物质空间，也冲破了人脉关系。最后一个是神，特指地方之神，是人跟历史的文脉关系。人需要归属于信仰，归属于神。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塑造，应该这三者都有，天地人神。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应怎样看待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設与资源之间的关系？
马清运：公私相通产生最小费用

随着一个城市的形态及生产关系都变得国际化时，城市空间传统公共性则减弱了，中国那种无形的、随时随地的公共性正在经历着根本的转变，并随之出现了大量共同的、大尺度的所谓“公共空间”，只可远观不可褻玩焉。这种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是资源浪费，它的存在根本就不能满足抽象的集体——人民的需求。只有将私有空间与公共空间交融，坚持无形的、包容性的、人文性的公共空间建设，才是最大化地利用了资源，这也符合中国传统“合而不同”的规则，只有公私相通了，才能消减城市建设与资源所产生的肌肤之痛，产生最小费用，这是“基本智慧”。当然这同城市公共空间没有任何关系。

王澍：设计应该更多的考虑资源与节能

二者之间肯定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大尺度、表面化的开发模式，是非常耗费资源的。设计不一定要很漂亮，它不完全是个艺术品，它是一个生活的容器，应该更多的考虑资源、节能。

李存东：既要瞻前，也需顾后

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設需要整合和消耗一定的社会资源。建设好了能充分利用资源并促使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不好会浪费资源并对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毕竟城市公共空间一经建成，就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城市生活。因此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設一定要慎重，不能盲目跟风；要有前瞻性，符合社会长期利益；要有生态意识，避免资源的无效使用和浪费。

庞伟：少依赖物质堆砌

资源匮乏，我们要学习少依赖物质堆砌，多一些空白，多一些野草，从而多一些诗意，多一些从容。

王向荣：新城市公共空间不能以牺牲资源为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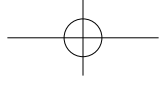
并非绿地越多、城市公共空间越大的城市就一定好城市，一个理想的城市是有生活气息、有活力、方便、自然、温馨的城市。城市公共空间只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创造新的城市公共空间不能以扩大城市规模、蚕食城市郊区土地、破坏城市的尺度、牺牲城市方便的生活为代价。

李津逵：节能省地缺少制度保障

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設一定要考虑对资源的占用。由于人的视觉和尺度感限制，公共空间在达到数公顷的面积之后，其利用效率会随着面积的继续增加而边际递减。耗费大量的土地、建材和在运营中的水电人工，换来的究竟是什么，需要理性地评估。可惜的是，当前中国城市的公共治理结构缺乏抑制浪费资源的建設冲动。以至于2004年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出通知控制大广场和宽马路，2007年国土资源部再一次发出类似的通知。节能、省地、降耗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設中得到落实还缺少制度上的保障。

张轲：打破30%惯例

这是一个挺关键的问题。盲目的、装饰性的公共空间，浪费非常珍贵的城市资源。实际上城市空间的内部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的空间还非常大，起码占30%。因为城市规划的一个惯性就是拍脑门，拍脑袋说30%的绿地，不管你这个地是多大，你一定要留30%的绿地，所以至少30%农田的我们可以不侵占。深圳有一个金融区的景观设计将绿地全部集中在一块，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心绿地，打破30%的惯例，高层或者超高层的建筑物地块里就不需要做绿地，提高了用地效率。这就是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一方面我们土地资源极其紧缺，一方面规划局永远让你退10m、20m，永远让你留30%的绿地，永远要切一个角，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从全局来说没有意义的事情。



王辉：公共空间要产生效益

首先，城市公共空间的空间资源支撑非常必要。比如通过针对中国人口现状的万科“围屋”公寓项目，我们发现，当私有空间越小的时候，人的一部分活动、一部分时间必须放到公共空间里，这时候公共资源的优越性和力量才会彰显。可以设想一下，未来当我们商业高度发达的时候，你每天可能就只会把家作为一个储藏室或者一个旅店而已，甚至你在城市会有好几个家，不断体验不同的东西，生活成本也不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

其次，在平衡公共空间和资源消耗矛盾方面，只要让资源可利用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比如很多广场，空间是有了，但只能产生一些“廉价”的活动，如扭秧歌之类的。这时候完全可以建造一些设施让空间资源更生动、更有效，使公共空间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在上海嘉定规划了一个镇，它有相当好的农业土地资源，不同于城市里一般的种植用地。所以，我们设想把一部分农业保留在城市里，作为城市农业用地让居民参与一些种植活动，作为丰富自己业余生活、提高生活情趣的一种手段，同时减少城市管理部门在公共空间的投入费用。但现实矛盾是，在中国很难把握这个度。中国人很精明，公共空间在目前的规划条件下，任何一个好的想法出来，一扭头就会被人滥用，而歪曲成另外一种东西。实际上公共空间完全需要有一些盈利性的机构或者商业做一些投入，来激活公共空间。比如像公园里的餐厅，占用了公共空间，同样也激活了公共空间。什刹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什刹海本来是一个绿化，但是加入了一些商业设施，就彻底被激活了，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公共空间。同时它也在盈利，那么它的存在、生长就不是问题了。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很大的城市公园，但公园周边有围墙，本来是很好的公共资源，但规划上规定了不能盖、不能建，利用公园进行公共空间的建设就变成了很被动的事情。

俞孔坚：城市公共空间应该多功能

城市公共空间应该多功能，可以是资源节约型也可以是生产型，比如说典型的稻田。如果仅仅是单一功能的、展示性的，它的土地资源就是浪费。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衡量标准应该是综合的生态服务。生产功能、游憩功能、水调节功能都是综合的生态服务功能。

吕斌：注重公共空间的生态功能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我们在以人为本，强调社会化的空间体系下，公共空间变得更加重要。当然，公共空间包括了一些基础设施的空间，一些文化、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当前的公共空间设计，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我们国家人多地少，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并不多，大量奢侈的公共空间与自然资源发生了冲突。因此，公共空间设计应该比较实事求是地把握，既不可缺少，也不可做得过分。第二，很多公共空间占据的土地，除了具备休闲、娱乐等功能之外，还有很多生态功能，比如泄洪、水的循环补充、二氧化碳的转换等。一些公共空间的占用与原有空间的生态功能之间发生了冲突。第三，公共空间本身也有美学上的效果和追求，但还是应该以功能为主。专家和政府都认识到了这一点，现在有所好转。但是在端正认识的同时，从技术、专业的层面，还要加强理论的研究以及科学的实践。特别是专业人员，还要能够摸索出一些符合我国不同地域特点的空间营造办法。景观设计师首先要具备复合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在公共空间里，有一些公共艺术的问题。公共艺术是引导国民进行美学欣赏、提高美学素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近年一些地方公共艺术品泛滥，品质粗糙，不严肃。公共艺术是与公众近接的艺术，但也应讲究内涵、注重品质，它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气质。

陈跃中：“大景观”理念

对资源当然要非常节约，要珍惜资源。目前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景观设计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景观设计师能解决的，它源于施政理念，需要政府从

根本上进行解决。大景观这个理念，就是强调景观师做规划。比方说做一个20Km²的新区规划，景观设计师会根据地形的高差决定哪块应该是湖面，20Km²的地表水全汇集几个水湖里面，就根本不用凿井。旱季来了以后，水逐渐会吸到地表以下，被植物根系吸收，水季旱季交替，形成了呼吸，这块地自然就形成湿地，不用景观师在别的地方再造了。比方说在奥运场地非要人工造个湿地，我看是比较可笑的一件事。因为你不可能形成湿地，要硬造的话代价太大了，没有必要。

乔全生：好设计应该使原有的资源得到发挥与强化

公共空间的建设和资源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认为公共空间应该是在了解当地资源之后，发挥资源优势、整合资源，创造出一个个产品。在经过这样的设计后，能够有效地发挥或者强化资源，形成一个互动循环链条，这才能称得上一个成功的产品。作品设计或是创作应该从场地资源出发，或者受到场地资源的启发，利用场地的资源来表达作品。好作品就更应该使原有的资源得到充分发挥与强化。

李建伟：资源是设计之本

不仅仅是公共空间的设计，每一项设计都牵涉到现有资源的利用和使用问题。资源是设计的依托。每个地域的历史、自然生态及文化特征都将通过现有资源得以体现，所以说资源是设计之本。城市公共空间如果能够更好的利用资源，可以节省成本、彰显特色，同时也可以创作出新的适合人民需要的空间形态来。

现在我们的城市公共空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尺度。城市道路非常宽，广场特别大。鉴于防洪的要求，河流也变成了人工的河流。大家可以看到城市中河流已经全然不是充满生机的天然河道，而是呈现出一种不该有的状态，一种笔直的，筑上堤、铺上水泥、砌上驳岸的河道，就像游泳池一样。自然的东西逐渐在城市里面消失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城市空间缺乏系统性。我们知道交通属于城市空间，广场、河流和水系都属于城市公共空间。大家知道怎么组织交通，却没有认真组织过城市里面的水系，组织城市里面的生态系统。城市公共空间的自然资源尽管是相互关系的，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梳理，所以说城市空间的设计缺乏系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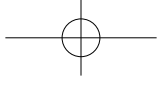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设计师，挖掘每一个项目的原动力非常重要。最本质的东西只属于这一个项目，这就是资源。将每一个项目资源的特质做出来之后，整个世界就丰富了。不是说每一个项目都必须做得很丰富，而是每一个项目都要有特征，就像每一个人一样。每一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人类是一个很丰富的群体。

刘伯英：公共空间是层次更高的资源

在城市规划中，公共空间的建设似乎是占用了建设用地，少盖了房子，造成了城市建设用地的“浪费”。但城市不能成为人口的“集装箱”，“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始终是我们处世的哲学基础。在城市居住、商业、生产等各功能区中，应该留有透气的“天窗”，让我们的身边有绿树相邻，有鸟儿鸣奏，有动物为伴，这才是和谐的家。城市的公共空间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蕴含了多种城市必不可少的功能，如公园绿地、集会广场救灾避难场所等，这些公共空间即使在土地价值最高的城市中心区也必须设置。公共空间也是资源，是层次更加高的资源。

吴钢：需要城市专家和设计师的共同努力

我们这10年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化进程最快的10年。实际上不要说在中国了，我认为在全球也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城市的发展必然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自然资源不断的缺失、被吞噬。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应该非常认真和非常负责的来思考城市化这样的过程和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首先要关注城市发展结构的合理性问题。目前这个系统在中国是以及城市的经济扩张为背景，围绕汽车发展的，而不是把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放在和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高度。城市结构的问题被放在经济发展之下考虑，先生产后生活，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先把经济搞上去。于是，城市发展会出现摊大饼这样一种状态。其实，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城市的发展可以像太极里所说的阴和阳，在整个结构层面上很均衡。要做到这一点，特别需要城市专家的努力。比如德国的慕尼黑，在发展的最初期，它的整个城市就设计了多条契状的绿带，包括英式花园（English Garden），插入一个城市体当中。纽约的中央公园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著名的城市学家和城市规划的学家们，资源是不缺乏的，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这是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了城市专家们，设计师对已存环境的态度也至关重要。我举个例子，我们公司的这栋楼实际上以前是一个变电所，把他租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做两件事：一个是铲平了，盖成新的；二是保留下来，加固一下进行一番装修。我们选择把它保留下来。实际上重新盖一个可能更便宜，因为加固墙体、重新铺设管线等等的维护费用不比新建少。但是从资源的角度讲，改造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从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

我们需要尊重已经有的东西，但并不反对发展，而是鼓励向别的资源消耗少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我们的生态技术、生物化学技术。因为这些技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更优美、更丰富以及更幸福的生活或者说一个更好的地球。

城市公共空间是综合设计展示的舞台，您及贵公司在当代艺术展现、人性化设计和生态适应方面做出了怎样的思考和实践努力？您认为应怎样平衡生态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王辉：现代城市公共空间本身就是当代艺术的展场

当代艺术是很笼统、抽象的概念，要界定什么是当代艺术是很难说的，但可以看到，当代艺术的最根本点就是群众的参与性，强调艺术与大众的沟通，脱离了群众就没有当代艺术，这是当代艺术能够介入到城市景观、城市公共空间资源里一个非常合适的切入点。过去的传统艺术，它只是服务于少数的、有一定修养、有一定文化的知识阶层，并不强调大众的认可。当代艺术在绝大部分艺术作品里，对大众抱着一种积极的、认可的态度。所以，当代艺术跟当代城市空间、公共资源融合得会更紧密一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也有可能产生在当代景观设计中。

第二，当代艺术在手段上不拘一格。景观设计的笔触很丰富，融合性强，绿植、印砖、水景、灯光等各种手段非常之多。同时，兼容的流派也很多，古典、现代或是非常前卫。有很多切合点在这里，所以景观设计和当代艺术两者本身就可以融为一体。

还有一点，当代艺术本身需要一种巨大的界面，它已经不是过去的花布之类。比如说多媒体艺术可能需要巨大的屏幕，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需要巨大的空间来展示它。景观设计它本身的画布就很大，它是地景，所以很多艺术作品需要融到这个背景里。

再者，当代艺术很多的表现为艺术活动，比如双年展等。这种展览绝大部分情况下，不是一种封闭式的展览，而是一种城市活动。既然它成了城市活动的一部分，就不是一个“关门”的艺术，而是一个“开门”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公共空间本身就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展场。

最后是生态和人性化设计，我觉得这两者和当代艺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样的、一体的，任何时候都会讲这三个命题。在非常有限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之下，设计应尽可能少地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用某种手段就能够实现很生态，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往往是用了某种手段导致了不生态。因为人类永远是在消耗，只不过是程度多少的问题。生态虽然是把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人对自然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但并不是让自然从本质上变成了一个永动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不符合科学原理。

中国城市10年里在景观方面的最大成就应该说就是城市核心地段的美化、绿化工作做得很不错，城市夜景、灯光做得很不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城市应该是更人性化了，因为人热爱这个城市、欣赏这个城市。人性化是什么？你喜欢就人性，不喜欢就不人性。但反过来讲，我们现阶段很多的景观设计更多的是造就一种恢弘的场面和气魄，它是一种排场，这种排场本身就跟渺小的个体之间有一定的矛盾。所谓排场实际上是集体的人性化，不等于一种个体的人性化。人是既需要个体、又需要集体的一种动物。你不能否认奥运公园广场上鸟巢、水立方产生的生动、辉煌场面不是人类所喜爱的。每天晚上那么多人挤在那个地方就说明了它的接受度、正确性是丝毫值得怀疑的。但是否每个城市都需要这样的场面呢？有些地方需要彰显一种集体的力量，有些力量则更多的是要还原个体的舒适度、减少资源的浪费。这些都是人性化，只是关注的尺度和程度不一样而已。

李建伟：生态必须由设计师来做，这样的生态才有创意、有灵魂、有精神

艺术的展现是设计的灵魂，资源保护是设计的灵魂，讲究生态更是设计的灵魂。也许有人会简单的说，先生态后艺术，或者先艺术后生态，其实都不确切。这些元素在设计中都是可以照顾得到、可以利用的。比如说，用艺术的眼光做生态设计，能够有创造性的把生态做好，实际上它就是一门艺术，也是生态学，它们之间不是矛盾的。所以，不能让生态学家做生态设计，应该让优秀的懂生态的设计师做生态，这样的生态做出来才有创意、有灵魂、有精神。

另外，为什么学校里的学生不知道如何用艺术的手段做生态？我们的学生学的是生态学家告诉他们的知识，不太懂设计的老师告诉他们怎么做生态，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要用艺术的眼光看待生态。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可以把设计做得非常艺术，同时也非常科学。生态和艺术不是矛盾的，一定可以相辅相成。

刘伯英：生态→人性化→文化

生态和艺术之间其关系不需要去平衡，因为这两种事物并不是翘翘板的两个端头，生态的艺术、艺术的生态，两者未尝不可有机结合。我们认为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中生态、人性化和文化同等重要，如果一定要分个层次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生态”是第一位的，首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是“人性化”的内容，要满足人们进入和实用的功能、尺度等要求；“文化”是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的精神追求，在景观设计中似乎也遵循“先拥有，后享用”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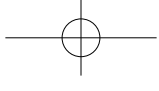
王向荣：景观是社会的、功能的、艺术的

多义景观完成了一系列城市公共空间的项目，尺度大的有杭州西湖西进、济南大明湖及环城护城河、厦门园博园等，尺度小的有厦门海湾公园、北京中关村软件园，还有一些建筑环境及住区环境。

我们的设计都在追求一种平衡，不仅仅是生态和艺术之间的平衡，而是寻求社会、经济、科学、艺术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平衡。我们以为，景观设计应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它们应符合科学和生态的原则、反映社会的需要、技术的发展和新的美学观念。我们的设计不会模仿过去，也不会重复自己。我们珍视传统的价值，但更致力于探求景观的同时代定义。我们认为：景观是社会的产物，不能无视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景观是功能的，今天的景观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设计是为当代人的使用而创造室外场所，应当体现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景观是艺术的，对艺术的兴趣使我们在设计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许多现代艺术的思想 and 手法。

王澍：城市、建筑、景观三者不分家

我这几年做得比较多的是城市、建筑、景观的混合研究。每一次做项目



的时候，我都不把它看作单纯的建筑项目，事实上，建筑本身包含着我对城市的理解，同时也包含着我对景观的理解。我觉得这三者是分不开的。

比如象山项目，我有意识地将它设计成低层高密度，使它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它跟巨大的草坪、开阔的广场式设计是截然不同的。原始、自然的资源，在场地里差不多保留了1/2。它适合于现代的生活，考虑到它是很多人使用的公共设施，所以它对人、对带有某种人文气质的活动考虑得特别多，处理好人和自然、建筑和自然的渗透关系，大量使用“回收建材”，节约了资源，利用低造价的节能方式，把建筑高度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就可以达到比较高的建筑艺术质量。

这就是平衡生态跟艺术之间的手段。这些问题是可以综合解决的。简单地说，我借鉴了城市的发展模式，设计了这个大学校园。可以说是一个在小尺度之内，对大尺度现实做探索性研究或者实践。因为我理解的好的城市，就是由很多种像这样规模的单元组成的。其实我做了这么一大片小区已经很大了，有0.5Km²，那已经是很大的一片城市区域了。

李存东：尊重使用需求，地域观念和生态意识，专业精神和艺术追求

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过程中，设计师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在设计中不仅要满足各方面要求，还要积极思考，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自己的理念和追求。几年来我们设计了多个城市公共空间，如布达拉宫周边环境改造及宗角禄康公园、无锡鸿山遗址公园、拉萨火车站广场、凉山火把节广场、西单商业区更新、鸟巢周边环境等等，通过实践我认为当下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中应注重平衡3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要尊重市民真实的使用需求，要从功能入手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要为了迎合业主的片面要求，盲目追求浮华的形态和主观臆断的空间安排。

二是要有地域观念和生态意识，认真对待每一个项目，积极探索项目独特的地域特征，并尽可能采取切实可行的生态策略，将项目融入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中。

三是要有专业精神和艺术追求，景观项目不仅仅是工程，它更具有艺术可能性和实现度，我们要通过自身的专业追求，努力将艺术与工程相融合，不断提升全民的集体审美意识。

陈跃中：城市公共空间更容易反映先进思考

我们事务所（易兰）获得了很多奖项，如通州的运河文化广场，是在这10年里面建成，获得了很多曝光度。它也反映出了在这10年里，城市公共空间的取向及审美趋向。我觉得城市空间对景观设计学意义比较大，反映出了一些最先进的一些思路、思考。如果你将这些思考放在一个居住区里面或一个社区里面反映，那就受到很大限制。第一谁给你钱去做这些实验品。第二，一个居住区它并不需要承载这么多的文化、思考、理念，所以在这些领域，旅游、度假项目、公园都有它的局限，只有在公共空间、公共广场里面，它可以展示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前卫的东西。

而且，经过10年的发展，景观这个行业成熟了，积累了一些品牌。以前有点群雄并起之势，经过这10年的过滤、沉淀积累下的一些队伍是非常优秀的，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而且各有各的特点。比方说我们事务所做旅游度假的项目比较多，北大可能做城市公共空间多一些。这些品牌各有优势，都分别获得了那一块相关的市场，这标志着这个行业的成熟。再有一个，一些国外的事务所在中国操作了10年以后，也对中国这个行业提升起了很大作用。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设计手法各方面更加成熟。我们这一批先行者，不光是界定了景观设计这个行业，还向人们普及了什么是景观设计，规范了行业。

庞伟：用设计思考，用思考设计

从参与设计中山岐江公园到最近的南昌利玛窦广场、深圳正中广场，我们坚持反对说一套、做一套，而是执着的实践，用设计思考，用思考设计，直面中国当代城市的现实。同时，借鉴广泛的设计和艺术素养，以泛设计的

广角度去工作。

至于生态观点，我们一直坚持野草之美，还植物本色；反对滥用模纹花坛，反对大树进城。同时，像某些人士戒食鱼翅、谨慎石景的使用。因为这些采石的地点来自河床溪谷。什么太湖石、黄蜡石，石材采集都直接破坏了自然生态。

俞孔坚：艺术创作不要多于人的需要

土人一直在致力当代性、人性化和生态适应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哈佛有一个人叫丹巴顿·奥克的人，他在全世界精选了26个当代景观设计师，比如彼得·沃克、麦克·哈格，土人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在通过景观做当代艺术的一个展示，而不是回到传统艺术、古代艺术，从岐江公园开始到永宁公园、沈阳稻田、红飘带以及最近做的桥园，都具有很明显的当代性。

其次，人性化。人性化讲的是白话设计、白话的城市。我们的设计都要求考虑日常人的需要，让艺术走入生活，跟展示性的景观设计完全不一样。比如红飘带尽管是一个艺术品，但是它是一个座椅，是一个城市家具。稻田也不是用来展示的，里面有读书的地方。有人觉得这跟彼得·沃克的形式很像，但其实很不同，我们的空间是给人用的，彼得·沃克基本上是个图案。

最后，生态性，我们做的每个项目都是生态性，都是倡导野草之美。生态性就是特别强调野草之美。生态环境是个基地。艺术只是基点上的个人点缀。红飘带就是个典型，它是生态和艺术的一个平衡。人不需要多占用生态基地。但是同时又要彰显人的存在、人的个性、人的特性，这些都是通过艺术来表达的。人跟动物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创造艺术品，能创造艺术。但人的艺术创作不要多于人的需要，不要把整个大地拿来搞艺术品，搞轴线，搞广场，这是多于人的需要的。红飘带就是告诉人们，人的需要实际上这么多就够了。

马清运：艺术和生态两者平行存在，没有平衡之说

我们的工作从来没有从“人性化”出发，如果有些项目达到的“人性化”的印象，那也是因为它们的过程具备了建造的根本目的和基本智慧。以玉山石柴为例，它是为父亲建造的，又在父亲的老家，使用的也是当地材料、石头、木料和工匠（村民亲戚），这是建造的根本目的。

艺术是个性人的主观需求，生态是群体生物的客观状态，两者平行存在，没有平衡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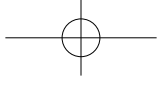
乔全生：跟空间的尺度、内容、任务有很大关系

首先“艺术展现”在国内还不是很成熟的环节。国内的市民对艺术的认知和对艺术的培养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今天谈到的艺术，不是指古典的传统艺术，更多的是现代艺术和生活品位。张艺谋的奥运会开幕典礼，我认为他的强项是把中国古代元素表现得非常华丽、美轮美奂，让大家觉得非常有情趣，非常亢奋。但是到表达现代元素的时候，就相对较弱。闭幕式上，英国虽然仅有8分钟的展示时间，但大家可以看到现代艺术表达的能力和强度。

人性化的设计，首先要了解当地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文化背景、资源及建筑材料。在对空间进行现代化艺术设计的同时，又有很深的环境底蕴，Context（文脉）的底蕴。

今天谈到生态、艺术和人性化的设计。对于不同尺度的开放空间侧重点就不一样，在每一个空间中关注的百分比也不一定完全一样。譬如说，在一个尺度较大的城市空间规划或者设计中，更多关注的可能就是生态；在尺度较小的环境中，关怀更多的则是人性的或者是艺术的展现。这也跟不同尺度的空间、空间的内容及任务有很大的关系。

生态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一个好的艺术要绝对尊重生态。很多现代的艺术作品完全是跟户外的空间能结合的，很多自然的材料，木材、石头、甚至水，都可以跟大自然或者是生态环境能够很好地沟通和结合。二者的关系如何完全看设计师怎么去诠释这个场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艺术手法和设计来



展现公共空间的自然的本质。自然的本质，就是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与生态环境互相尊重，和谐表现而不是矛盾冲突的手法。

马晓晖：不能只是过过嘴瘾而已

我们每一个项目，不管这个项目是大是小，什么性质，参与非常重要，我很珍惜每一个机会。我不太喜欢去谈非常空洞的大理论，如果一个空洞的大理论落实不到具体的细节上，这个理论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落实到细节上，就是落实在每个项目上，把每一个项目负责任地盖出来，因为它是社会的浓缩，也包含了经济、社会层面的问题。一个城市的发展，就是每一个项目的积累，达到一定量才产生质变。

如果我们只追求一个大的概念，而没有量的积累，它往往不可能产生我们期望的质变。比如你走进北京一所一流的大学，你会发现它的人行道一会儿跟马路合到一块儿，一会儿你又要踩到草地里边去。大学里边居然没有一个完整的步道系统，这是很荒谬的。现在对大题目的关注并不缺，中国真正缺的，反而是要把类似这个步道系统的小项目做好。我一直拿30多岁的人来比喻现在的中国，而拿60多岁人来比喻现在的美国。年轻的中国有年轻的心态，我们景观设计专业也非常年轻，有冲劲，但是还缺乏老练的做法，缺乏踏实的积淀。所以如果我们要追求有实质的变化，恐怕还得几代人踏踏实实地把每一个角落处理好，去解决实际问题。设计师如果去空谈一些自己无法触及的东西，那只是过过嘴瘾而已。

城市化的过程是多方面利益博弈的过程，您认为设计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李津逵：有些像会计

公共空间是一种公共资源，其规划过程就是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如同公共财政做预算一样，公共空间的设计是一个政治过程。因此设计师的工作有些像会计，他是一位专业人士，但是服务于相互合作又相互博弈的股东们。

与会计工作不同的是，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过程中，大量的公众处于失语状态。设计师面对的是甲方，也就是地方政府的领导。这个时候，设计师常常会面临一种深刻的矛盾：甲方可能会要求他做一些不符合专业规范的设计，例如设计一条过宽的马路、一个过大的广场等等。如果设计师坚持自己的职业原则，可能就会丢掉这一单业务，甲方再去找来“听话”的设计师将其实现；如果听从甲方的要求就会违背自己的职业原则。我曾经在一次培训班里调查景观专业人士如何面对这种难题，结果，超过半数的设计师们认为首先还是要按甲方的要求来做。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管理和执行过程，就会知道好的规划和设计距离好的实施还有相当的路，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部门的权力利益之间的博弈，会使一个好的方案不断地减分。

所以，设计师在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中的创造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令人遗憾的作品，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时代的烙印；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作品，也不要简单地认为这就是设计师的创意使然。

刘滨谊：中间协调人

中间协调人。

马清运：调停

设计师起的只是“调停”作用，真正影响城市形态变革，城市生活变化的，不是设计师，而是其背后的政治目的、经济方式以及生产方式。

李建伟：桥梁

应该说设计师起到的是桥梁作用。他们使社会各阶层的人能够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形成共同的认识，共同打造个项目。

我以前有一个老师在美国，他是做规划的，是美国最好的规划师。他认为

为规划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是“政治”的手段。他认为政治实际上要集思广益，把大家聚到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政治不是绝对的正确，它是相对正确的，使大家得到一个共识。实际上他对规划的认识十分透彻，规划不是一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要有一定的能力把大家聚到一起，然后照顾到各个方面的利益，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一个事情做好。

所以说应该让设计师知道怎么跟政府打交道，怎么跟开发商打交道，怎么跟普通的老百姓打交道，把大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才可以做好一个项目，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

设计师总是对作品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其实有些只是个人之见，有些就是你还能力去说服沟通造成的，所以一个好的设计师一定要学会怎样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刘伯英：缓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

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满足城市发展需要的大量劳动力。不可否认，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先后的差别，存在文明程度的差别，存在着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城市化中多方面利益博弈正是这些差别的集中体现。设计师是不能左右城市化进程的，但可以通过自身的专业技术素养，发现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比如城市功能适应性问题、征地补偿与社会保险问题、居住社区的社会分层问题、远距离就业的交通问题等等。这些社会问题不及时解决，就会酿成大的社会问题，造成比较大的恶果。

朱育帆：设计师成长空间广阔

中国特殊的人口强度造就了与西方非常不一样的规划设计的游戏规则，所以才会有当代中国城市空间品质和广场大尺度需要之间的错位。虽然学术界对中国现在的城市公共空间尤其是广场设计批判很多，但是从需求而言显然适应了当代生活的要求，只是设计师还没有找到足够的方法应对这种利益博弈。所幸当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设计实验场，为设计师的快速成长提供了足够大而广的空间，可以看出中国设计师的进步速度是惊人的，特别是近10年，已经有一些作品的品质慢慢被洗练出来。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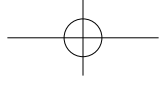
吴钢：设计师最大的博弈是和自己的较量

当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已经使得大环境产生一些结构性错误的时候，设计师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去纠正他们，你没有什么可以博弈的，你要发出你的声音，既不要抱怨，也不需要苦恼，应该有一个更积极的态度。作为一个设计师，即使你没有任何可以施展的地方，你还有你自己家的阳台，表达出你对自然的態度，它也是可以非常强有力的。我的教授Kienest在没有做景观设计的时候，把自己家的墙壁全都种成青苔，住在一个长满青苔的房间里面，在自身的居住环境中进行设计实践，后来他开始有项目做了，并成为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师。所以你没有跟谁去博弈，如果有博弈的话，你是在跟里自己博弈，你必须去战胜自己表现的欲望，去做真正有用的设计。

我们今天的设计师更多的是被训练成了一个有手艺、有一个养家糊口能力的人，但他缺乏一个对自我的认识和对地球或者对生活状态和环境的基本关怀。作为一个人，是生在自然当中的，你不去关注自然，自然就会报复你、惩罚你。如果你对自然界的关心就像关心你的胃一样，那就不会有问题，也不会有抗争和博弈，也不会有利益，因为肚子饿了就吃饭。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梳理你的自然，梳理你周边环境。所以我觉得人和环境的问题还是一个对自我理解的问题。

庞伟：实现业主的想法是他的“本份”

设计师多数时候还谈不到是博弈的一方，他没有立场，也不敢代表人类的设计文化。他只是绘图，“最新最美”的图画，最好有效果图、鸟瞰图。他要谋生，绘图，置身服务行业，实现业主的想法是他的“本份”。



马晓晖：积极的参与者

设计师应该是参与者之一吧。景观设计当然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但反过来讲，我们毕竟是众多专业之一，一个城市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要考虑到，所以如果我们只抱持一个“纯景观”的想法，用纯景观的思路，去说明一件事情，说服力不是很强。但是如果我们把景观的一些理念融入到这个社会里去，那么我们的看法就会更加容易被接受，容易发挥它的社会效应。反过来讲，当一个设计师更加关注社会、生态、经济问题，关注这种宏观层面更多的时候，它也能够使自己的设计有一个很大的改观，不再只是关注一些纯景观的细节或要素。

李存东：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相对政府、发展商、使用者而言，设计师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前三者的利益是明确的，是可以公开表述的，而设计师的立场往往不容易确定。更多情况下，设计师要用自己的专业素质平衡三者的利益关系，努力使各方的利益获得共赢，同时又要实现自身的专业追求，对城市发展负责。从这个角度讲，设计师更应注重职业精神的培养，不能只追求自身利益而无原则迎合，也不能缺少专业水准而提供了最优的解决方案。

陈跃中：重要的一员

博弈，而且多层面。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都会在城市公共空间上反映。10年看起来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它在不断地反映出最新的一些文化、政治、设计理念。从规模也能看出来，有一段时间是规模庞大，曾经出现了一些县城的县政府广场跟天安门广场的规模差不多。这样的一些，当然这有施政者个人膨胀的这样一种欲望，但是背后的支撑是一种自豪感。就跟我们办奥运会一样，是一种自豪感。可能这个奥运会在别的国家是一个平民的狂欢，但在这儿，可能它就变成了一个符号，中国政治崛起的符号。这些广场都是代表。现在一些精英人士，开始寻找新的价值观念，比方说节能、公民化、平民化、尊重人权、尊重历史包括工业遗迹、对这种历史文脉的发掘、生态、绿色等等，这一些价值观重新在最新的一页里面要重新进入我们公共设计的视野里面。反过来公共空间设计它应该是什么？它就是不断地反映最新的思潮。但是如果你把它完全局限成一个设计领域的事，我觉得就可能说不全，它不完全是设计领域的事。

王澍：思想传播者

现实中，我们很多设计师一味地附和官员，丧失了设计师该发挥的作用。我的实践体会是，通过做思想工作，发挥专业的能力，很多时候是能做出好的结果的。设计师要发挥作用，他必须要有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除了是一个设计师之外，还应该是思想传播者，甚至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要不发挥不了这个能力。

当然，这个问题，还跟大学教育有关。如果在大学教育里不能够让学生有一个清楚的价值观念来指导设计的话，那么大学教育就失去了它基本的功能。大学是这个社会的良心，应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乔全生：教育者

设计师在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在中国至少应该是一个协调者，或者是一个教育者。设计师在西方社会可能更多地扮演了协调人的角色。但是在中国，因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近期发生的，而且非常快速，这就导致了某种实践科学的缺失。对学术界及媒体，一个好的城市设计者应该同时扮演教育者的角色。易道的标志就是推行国际化和本土化，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把国际经验带到中国来；同时利用对本土的认识和技术知识，把国际经验有效地落实在中国的项目中。易道办了很多论坛，也出了很多书，很多资深设计师也在学校授课，在社会上讲学，这不仅仅能借着某一个项目（事实上上一个公司能做的项目非常有限），把对项目的理解、对项目的理想和对

社会建设的抱负，利用不同的媒体形式传播给社会大众，包括政府机构、开发商和学术界。

王向荣：承担社会改良的重任

设计师代表了一种责任，即社会责任。设计师有责任和能力承担起社会改良的重任。设计是设计一种生活、一种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另外，尽管全球化的进程使得世界逐步向一体化迈进，但是设计师、特别是景观设计师必须承担起维护每个区域固有的特征，包括自然特征、文化特征和生活方式的任务。

王辉：景观设计师应更具有斗争精神

设计师永远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因为一方面，要满足设计任务的需要，无论是个体的甲方，还是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有自身的审美规律、设计逻辑。这两者之间，不是永远能走到一起的，尤其当价值观产生冲突的时候，两者之间的斗争更加剧烈。假如没有价值观的斗争，只是一个审美品位的问题，很多事情是好解决的。

比如说，设计师可以不服务于一个审美趣味比较低下的业主，或者业主可以雇一个审美趣味更高或相近的设计师，只要没有价值观的冲突，设计本身没有大的问题。价值观是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人类从来没有统一过价值。我们之所以要说是因为人类不和，之所以讲统一是因为人类不统一，这是人类先天的毛病、缺陷，所以不可能做什么事情都随愿。在价值观问题上，虽然说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每个设计师首先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观。很多设计师将价值观问题单纯地认为是审美观问题，这就很容易碰壁。设计师不应该随着业主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他完全可以不去做和自己价值观对立的项目。

但景观设计不一样，因为它是公益事业，哪怕为一个封闭社区做景观设计，它也是一项公益。建筑师或者室内设计师，可以为一个业主服务，满足业主个体就够了。比如设计卧室，业主说就不爱住圆的床铺，如果非要给他设计一个圆的，这个设计师就没道理。但是，给小区做景观设计，开发商觉得这个东西应该用方的，而景观设计师从更多人的角度觉得应该用圆的，那就应该去斗争，因为景观不是为开发商个体服务的，这就有斗争的理由和条件了。所谓公益，就是它既不是开发商利益，也不是政府利益，而是公众使用者的利益。作为景观设计师，应该首先在公众的角度上确立价值观，具有一种斗争精神，借用每一次设计机会，去跟价值观上不符合逻辑、不符合人类进步标准的业主斗争，为更多人争取到公益。景观设计师天然的社会责任更重一些，必须要有批判精神、必须要衡量价值观。

此外，景观设计师应该是四大家。首先是科技工作者，他要有非常丰厚的科学知识。因为景观从科学角度来讲，第一大功能就是如何创造城市生态，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课题。第二，景观设计师应该是文学家，他能设计出很多场景，让景观能说话，有文学上的感染力。比如说做一个小品设计，让人更容易在里面花前月下，触景生情，那么谈恋爱的成功率可能更高一点。第三是艺术家，所有设计或多或少都有一定艺术创作的成分，但做出来的东西必须要美好、优雅，丑陋没事，但一定要有感觉、有灵气。如果拘泥于画图案的话，那就太没出息。最后，景观设计师应该是哲学家，不管你坚持哪个学派，要把设计这件事想明白了，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自己不明白事，还想去做，那做出来的东西就不痛不痒。

俞孔坚：说服决策者

设计师首先应该扮演规划师的角色，规划先于设计，应该有更大的眼光，从国土开始，从区域规划开始。只有这样，他才可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他能否说服这个决策者，他只能通过说服决策者来实现抱负、实现角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在决策者教育方面做很大努力的原因。从《城市景观——与市长交流》到跟部长们讲课，



再到各个市长的讲座、培训。只有这样，设计师才会通过决策者发挥作用，否则，设计师只能扮演一个绘图工具的角色。设计师要真正发挥他的作用，就应该从改变决策者开始，改变甲方开始。

房地产浪潮下的居住区环境问题

在十多年的房地产浪潮中，您认为中国人的居住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具备怎样的时代特征？

庞伟：居住难

新住宅、楼盘变多了，也更昂贵了，买房更难了，房子边也不能再种几分蔬菜地了，邻居不来往、不认识了。没有车，许多楼盘完全不能住，出入靠步行完全不现实。

俞孔坚：有居无栖、有城无市

多年来，城市居民首先的变化就是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我们以前都是无产者，所有人的房子几乎都是没有产权的。第二，从栖居者变成居住者。大量的栖居是人跟土地、人跟四合院发生紧密关系。但现在，开发商创造房子，居住过程变成了商品，人跟土地之间实际上失去了联系，变成了人只是在居住。我们有产权了，但失去了栖居，变成了一个居住者。然后社区变成了小区，这个过程再放大，有马路没街道，有城无市。环境变得漂亮，但是失去了诗意，到处都是这种化妆式的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太多的刻意，太多的矫揉造作，失去了鲁迅那种百草园的味道，失去了平常、实用。所以我们要倡导居住白化的城市，比如说居住区可以是有菜地、麦田、稻田，真正种花、种菜的，而不是无用的。居住者又是生产者又是使用者，经过劳动和分享劳动的果实建立人跟人的关系、社区和邻里关系，让人能够找回他的社区感和归属感。今后10年，回到乡土将会是一个高潮。

李存东：3个阶段

在十多年的房地产浪潮中，居住区环境的塑造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十几年前，居住区建设完成后开发商往往请当地园林绿化部门进行简单绿化，然后交付使用；第二阶段随着景观设计的介入，开发商开始请专业的景观公司进行设计，并注重包装宣传；第三阶段在近几年，开发商对小区景观建设的投入越来越多，并以此形成竞争力，景观环境成了衡量居住区品质的重要因素。

刘滨谊：从求量到求质的转变

从求量到求质的转变。

吕斌：宜居、生态、安全

我觉得所谓房地产浪潮，指的是居住需求非常大，形成一股热潮。应用“房地产浪潮”这个词需要谨慎。在住房建设需求非常旺盛的一个时期，我们应借助这样的机会，营造一个宜居的、生态的、安全的居住环境，这个机会很难得。

王辉：景观设计变成了一个必须

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10年、15年以前，绝大部分中国人家庭，地面是水泥地，没有铺装；今天绝大部分城市家庭地面或多或少都有某种形式的铺装。这是中国居住产生巨大变化的一个小小的证据。景观也一样，景观设计变成了居住区设计中一个独立的设计门类，甚至有些景观设计师的地位超越了楼盘的设计师。景观设计变成了一个必须，这就是时代特征。

王澍：向所谓西方标准的现代化靠拢

从物质形态上看，向所谓西方标准的现代化靠拢，这是非常明显的。新建设的大量住宅，如果进行综合评价，比如说社会价值，邻里关系，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它对城市结构和城市空间的贡献等方面。此外，我觉得在过去十年整体上房地产开发都采用的是比较失败的模式，成功的很少见。因为基本上都是像封建割据式的开发，破坏了城市结构，这是圈地运动的结果。

马晓晔：回归理性

这10年来居住环境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应该说，景观在居住环境里扮演的角色，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0年以前谈景观的话，它只是一个绿化、美化的角色。今天如果去跟开发商谈景观的话，他认为景观已经是一个增加销售卖点、提升售价、打响知名度的至关重要的手段了。消费者也看到了景观的市场价值，他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这样的一种环境。但是我们的景观设计有一个现象，就是做得比较“过”。为了赢利，它用堆砌的方法给人营造出一种尊贵感，很多不该用的材料被用上去，比方说南方植物材料放到北方来，完全违反了自然规律，甚至违反了商业道德。

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它还是在回归理性。随着社会整体走向成熟，我们景观设计也会逐渐走向成熟，更加强调生态和可持续，减少对水的依赖，增加对雨洪的利用。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完善，法制的完善，我们的景观专业也在朝一个规范和完善的方向去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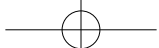
是不是随着法制健全、正确观念的树立，以后一定会有非常正面的作用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比如美国，它的法律与全世界各个国家比起来算是相当健全的，我在美国待了12年，大量时间花在了具体的设计上，感觉到还是存在问题。美国的法律规定设计要充分考虑到残障人士，这对这个群体是个保护，我很赞同，但是有些时候还是有点过，因为每个设计都要符合这个法律，就不能这样、不能那样，限制过多，束缚了景观设计师的手脚。景观设计本身也是个艺术形式，它不只是一项环保技术，我们做的不是环保科技。如果刻意地强调艺术或环保一方，都是对另一方的不尊重。我们在尽可能的考虑到各种人群的需求基础之上，也不能忘掉它需要艺术感染力的成分在里边。特别是在中国，我觉得这点尤其重要。一个公园或者绿地，它不但存在其物质面的功能选择，还是一个人的精神绿洲，存在着想象的成分在里边。目前中国远没有达到法律过剩的程度，我们不必过于束手束脚。我呼吁建立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健全的与景观相关的法律，这一点非常重要。

刘伯英：新交往方式影响设计

过去的10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的10年，人们在居住面积和居住条件不断提升的同时，对居住的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从基本的绿化面积指标，到绿化景观的品质和文化内涵，逐渐升级。从“四菜一汤”的居住区规划景观布局，到古今中外多种景观设计手法的灵活运用，配合居住建筑风格，形成居住环境发展“百花齐放”、景观功能、视觉效果与文化内涵、生态理念并重的时代特征。但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就是现在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交往越来越多元化，过去的邻里活动现在越来越少，家门一关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通过网络、电话联系。交往方式的转变带来社会生活的转变，进而带来空间的变化，影响到居住区的规划和景观设计，影响到住宅的建筑设计。

乔全生：全球化特征

居住环境从封闭的、或者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转变到商业社会的、开放的、互相沟通、互相交流、强调邻里关系、强调生活品质的环境特征。它同时也是对整个中国城市的开放、对外界资讯快速传播、和国际化生活习惯调整的一种反应。



时代特征就是地球村。全世界的信息非常透明，好的生活品质、好的居住环境，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不论房地产开发商还是居民都非常了解，会追求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国际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交通方式、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都越来越国际化。国际化过程中，还是要保留本土的特色和方式，但是没有办法避免国际化的潮流。这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行为。

陈跃中：生态——未来的居住主题

房地产方面的影响，主要是一些私人的金钱对于景观行业的支持和带动。实际上，我们景观设计服务的是买房人的需求。这方面的景观设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开始大家都追求西化、洋化，所以把想象中的一些西方的东西，欧式的也好、现代的，做的非常“硬”，应该是在2004年以前，普遍追求硬质景观，过于追求设计语言的表述，硬质的景观多于软质景观，设计追求堆砌。然后逐渐地，设计师越来越结合市场，感觉到追求的设计实际上是一种很休闲的、放松的状态，植物多一些，地形变化多一些。慢慢发现原来是最质朴的、原始的才是他所追求的风格。景观最主要的目的是给居住区带来休息、带来休闲，他忽视了一个问题。这10年中，前5年追求硬质，后5年追求软质。我觉得未来有新的东西提出来，应该是生态。这个生态绝不仅仅是绿色甚至可能不是一个概念。实际上这个东西需要我们从业人员慢慢给它定义。比如说高尔夫球场很绿色，但是它一点也不生态。但是有些很生态的东西不一定是绿色。不一定美，不一定漂亮，漂亮的东西它不一定是生态。

沙漠景观设计虽然满眼黄色，但也是很生态。生态的东西它有生命力。比方说我们为办奥运到处摆花，它不生态，因为它浪费很多水，而且它不能持续，这不叫生态，这只是绿色，但是不生态。但这个理念必须为买房人接受，因为我们原来走过弯路。我们服务于买房子的人，当然我们要引领他，但是不能离市场太远。但是，恰好我们买房子的普遍的老百姓意识到了这一点，排放有害气体对他们不好，节能、节水这都是他们的诉求。

房地产行业，地产开发商为获得更多的价值，不断增强项目的综合品质，纷纷对居住的环境建设进行独立投资，您怎样看待现时的、普遍的中国居住区景观设计？

刘滨谊：华而不实

盲目西化、华而不实，缺乏对于日照、通风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关注，更缺乏细致的人性化使用的考虑。

刘伯英：居住区景观设计的繁荣时期

从建设标准和建设质量上说，我们的居住区建设总体上比社会福利分房时期要好得多，高档社区比廉租房等低标准社区景观建设要好得多。地产开发商对居住区景观建设的投资是可以得到足够的回报，甚至是超值回报，这正是地产开发商之所以在居住区景观建设进行投资的驱动力。许多居住区的景观设计是出乎想象的，比如北京的星河湾、龙湖的艳澜山，都具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景观效果，包括景观建设的理念和方式，也让你难以想象。因此我觉得，中国居住区景观设计已经到了繁荣时期，受到社会公众、开发建设单位普遍关注。当然我们也要反对给居住区通过景观建设搞“豪华包装”，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我们还是要把钱花在多解决实际问题方面。

陈跃中：生态方面存在问题

过多的雕琢，对于景观设计造成很大浪费。比方说，过多的浇灌、凿井对于水资源是浪费。很多绿色的堆砌变得越来越不生态，甚至比原来还不生态。人们对于生态的理解，确实有局限性，审美观还没有转变过来。另外，功能方面的缺失是个问题，应该深入研究居住区中涉及到人的使用功能方面。

李建伟：缺乏原创性

以前基本上没有太多考虑住宅区景观设计。大家顶多栽两棵树和种点花草，等等。基于景观能够给地产带来增值这样一个观念，现在的开发商都想做景观，通过景观的投入，提高房价和竞争力。

在房地产景观设计方面，景观设计师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很难前行的境地。大家的设计就是那么一汪水，那么两个喷泉，然后把铺装做得花里胡哨。景观设计师在房地产项目里面缺少平和的心态、缺少原创的精神，大家或多或少地把最时尚的东西填充进去，把有创意的设计复制过来，然后变得毫无创意。

因为缺乏原创性，所以大家都在跟风，项目做得非常商业化，其实住宅区也应该做得很有特色。作为设计师你得有一个好的创意，然后怎么用简洁、痛快的方式表达出来。

庞伟：房地产文化水平决定景观水平

居住区的景观设计是房地产商品的一个部分，他要迎合你、吸引你，甚至迷惑你、忽悠你。今天我们房地产文化的水平决定了房地产景观的水平。

王向荣：居住区景观与商业联系太紧密

现在中国居住区景观的最大贡献是彻底消除了居住区中所谓的中心绿地、组团绿地、宅旁绿地之间的界限，将居住区的绿地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在10多年前就曾试图打破这种教条。今天，中国已出现了一些非常不错的居住区景观设计作品。中国人的居住环境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变化了，中国的城市面貌也随之改变了。

我们多义景观曾完成了北京“纳帕溪谷”的设计，除此之外，我们很少从事居住区景观设计，原因在于目前中国普遍的居住区景观设计的方式与我们对景观的理解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认为“纳帕溪谷”已是目前中国居住区景观中一个很好的作品，但仍然很不好意思将这个作品展示给我们的外国同行。我们宁可有限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一些公共项目中，因为在这些项目中，我们更容易实现对设计本质的追求，而目前国内的居住区景观与商业联系太紧密了，在许多项目中，设计师无法摆脱过度设计、商业设计甚至布景式设计的局面。

乔全生：设计以商业噱头为利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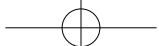
现在中国居住区的景观设计，还是停留在商业噱头为利导的时代。它属于商品包装。消费者得到一个非常精美的花园，而这个花园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只提供视觉享受，而不能提供生活的实用性。从建筑到景观，形成了很多“主题”，比如巴厘岛式、罗马风情、西班牙地中海的。大城市的这种现象可能稍好一些，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甚至于十线城市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形式主义的景观工程和景观设计，而对真正的生活方式、当地文化则没有顾虑。这是一种以商业的噱头为出发点的包装。过去10年来，很多大城市的居住区已经开始在改变。但是这种商业的装饰风格在中国大部分城市中还非常普遍，未来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李存东：景观的大量投入带来物业成本的增加和资源的掠夺性浪费

在越来越多景观投入的背后，是对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追求。在此起彼伏的商业竞争中，现时的居住区环境越来越细腻和精致，业主在享受极致的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生活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景观的大量投入已经脱离了应有的本分，成为抬高房产价格的助推剂，并由此带来物业成本的增加和资源的掠夺性浪费。

王辉：批判过度设计、呼唤适度设计

景观作为单独的门类，有一个单独费用去经营，这绝对是中国居住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过分设计，一砖、一草、一瓦、一木，每个地方好像都有点设计，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如此。巴西利亚



是现代主义城市非常典范的模式，它的绝大部分景观都做得非常粗犷，它不是到处种花种草、三步一景那种景观，人们却在那里待着很舒服。中国传统园林它规模小，使用的人又少，所以要设计得很丰富很细腻。但是现在居住区都是100m的高层，高密度的城市空间里，过度精耕细作的景观经营方式与城市的气度是不匹配的。

吕斌：“居住改变中国”

我国的房地产获得发展的时间无论多长，相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国家，其实还是很短的，然而中国很快会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中后期。现在如此大规模的、形成“居住改变中国”之势的时候，开发商更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因为他不仅在建造居住区，还是在“造城”。

第一，营造住宅，特别是大面积提供住房的时候，要有一种社会责任。营造居住环境，实际上是在营造城市的一种新的氛围，包括景观、生态等方面的功能。第二，居住环境应因地制宜，形态应该多元化。另一方面，我们在强调生态化、园林化居住环境的同时，也要有“度”。生态环境要优质化，同时效率也要高。不要建设大量的封闭小区，要提高其开敞性、公共性，让诸如绿地之类的因素有一些共享性。我最近在研究紧凑型城市，或称可持续城市形态的时候发现，从实现“低碳城市”的视点来看，香港和新加坡的城市形态也有许多可取之处，它们的步行距离短，公共交通发达，到一个集中的绿地寻求郊野氛围感觉要比北京来得容易。北京绿地也挺多，很大，但是有许多是沿道路的绿化带，可进入性差，不可参与，因此要加强对绿地可进入性的评价研究。

张轲：居住区的整体改善需要开发商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地产商的开发，居住区内永远做的是很好的，而且也会维护得很好。最常见就是你进居住区，景观非常漂亮，所有的树、一花一草都是精心培植。墙内的树都很大，然后一出院门，墙外的树却比大拇指还细，没有铺装，尘土飞扬，墙内和墙外的差别十分明显。其实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角度来说，这无懈可击，因为那些地本身就不是他的，责任还是在政府。这就需要政府的园林部门发挥更多的主动性，我觉得园林部门的主动性是比较弱的。比如说我种五百颗大香樟树，每颗香樟树还要再给他几千块钱的维护费。我们要帮他们在城市绿地种树都不可以，原因是维护也是要花钱，所以这个矛盾其实听起来是挺荒谬的一件事。政府应该更主动地去控制城市，随着老百姓的税交得越来越多，政府不缺钱做这方面工作，房地产商为了卖楼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居住区内景观做好。

近十年来，大量的居住区景观设计是以居民对美的视觉感受和便利的使用为主导，商业运营和实用主义原则的设计是大量房地产项目的一般特征，您如何看待地产项目中当代艺术的探索、生态学的应用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下的设计实现？

乔全生：中国居住区景观设计对这几方面考虑较少

开发商对这几方面的考虑较少。新的噱头、新的卖点、新的故事能够吸引购买者来购买开发商的商品。另外一点，大部分的开发商都希望能够低成本上、造价上和工体上尽量达到经济上的效益。施工品质、施工材料、或是设计语言，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空间。居住小区，在所有类型的景观设计中，它的进步空间是相对有限的。大部分房地产开发商对景观建设的承受度，我个人认为还是滞后的。未来应该有一些专业协会来带动发展。在西方，每个专业都有非常好的协会，当然国内也有所谓景观设计协会，但它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来带动专业学科发展，或者改善甲方、乙方关系。

陈跃中：审美根据需求产生

包括对于乡土树种的使用，节水、节能的这种景观设计，应该达到高环

保、低维护的要求。否则设计就有问题了。审美观方面，这10年实际上景观的审美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于我们如果组织一个景观设计竞赛的话，以前很清楚谁是第一名，现在可能你认为他是第一名，我可能认为他不及格，审美观已经有了颠覆性变化，是人的意识在发生变化了。这种变化还在发生，但是包括我们大部分从业的设计师在内的很多人，还没有领会到这种变化。以前、包括现在，可能看精雕细刻、很精致的东西很美，未来也许不是这样，看着一片野草有可能认为很美。

我们的审美是根据我们的需求产生的。

人类对于健康美好事物的向往就直接影响他的眼睛，它一定是逐渐反映的。工业遗迹，还有一些文化遗址，以前我们发现它破破烂烂，在这十年里面这些东西越来越少，它变得越来越美了。以前是静止地看待，把它保护起来。后来人参与其中，把它变成餐厅、酒吧，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结合。这10年绝对是这些审美观发生巨变的10年。这使得我们开辟了很多新的领域，以前的一些传统的景观设计还有它用武之地，但是有一些新的领域，就需要有新的审美鉴赏力的设计师进行开拓。

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强调设计感的传统事务所、传统的教授，实际上不被美国《景观设计》类杂志所推崇。美国《景观设计》类杂志所推崇的东西是一些很前卫、非传统的审美观指导的一些项目，比如生态。这10年，我觉得景观设计领域至少是拓宽了，余地会越来越大。

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设计师应该开拓更大的空间。你如果仅仅是想要守住你那块自留地，那就完全不适应时代的要求。

景观设计事务所里面几个主要的驱动者，他们对这个行业的拓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个行业面临着很大的机遇，如果不开拓，可能只是一个小行业，如果努力，则有可能变成一个大行业。这对于从业人员都非常重要，关键在于行业的领袖人物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景观设计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是抱残守缺，还是不断地开拓新的“蓝海”？很多行业实际上都是如此，它可以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逐渐被边缘化，也可能越来越变得重要。

李建伟：最经济，最美观，最实用

可持续性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探讨，不仅仅是生态可持续性，还包括社会的可持续性、经济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生活的可持续性。美国和欧洲的城市和小区，虽然历经时代的变迁，但生活其中还是会感觉十分惬意。不像一些设计，人们在建成后的第2年、第3年就期待着把它们拆掉，这就是不可持续性。一个整体的设计，不论从生态还是经济方面都要保持它的可持续性。比如，物业管理费太高了，别人买不起，没有办法运行，那也是不可持续的。真正的设计师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实现最经济、最美观、最实用，这样才能使每一个项目的开发商、业主满意。房地产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投入之一，是生活水平提高与否的重要指标，人们都期望它能够升值，能够变得更美，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庞伟：这只是销售策略

这些（指当代艺术探索、生态学的应用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地产项目中都很个别，也是被当做吸引眼球的销售策略使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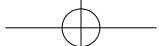
王澍：应支持和鼓励

现在这种探索实在太少了，只要有这样的探索，都应该支持和鼓励。

我接触到的这样的实例有，但是有限。从城市的发展来说，大的这种前提，比如土地割据式封闭设计，这种大前提是错的话，在公共空间去做个大的景观，找点所谓当代艺术的东西放在里面，为了维持绿色、生态、可持续，设计了草坪、花园，这基本上就是一些涂脂抹粉、修饰性的工作了。

刘伯英：目的积极，但效果不一定好

由于我国景观设计的从业人员是从传统园林专业到当前的环境艺术专



业，他们对景观的视觉效果非常注重，同时也兼顾了景观的使用功能，但对景观设计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注重不够，对景观在居住区微气候调节中所起的作用注重程度不足；对小景观与大景观的关系、景观对动物的关系、景观与气候的关系关注不足。缺乏在技术层面的实验性的景观设计和景观建设的后评价，以及在后评价基础上的调整，景观建设往往是“一锤子买卖”，草一铺，树一种，景观好看，房子好卖，就万事大吉！什么可持续发展啊，什么艺术探讨啊，统统靠边站，没有实际意义，这可能是多数景观设计的现状。很多楼盘设计了水景，不管楼盘位于南方北方、气候条件、当地的水资源怎样，这些水景在生态上起什么作用，这些都统统不管，一味的追求小区景观的漂亮或者楼盘的卖相，这是我们景观设计的悲哀。中国园林之所以流传几百年，主要在于它的文化性，以及体现小中见大、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因此在我们日益注重文化传承和技术应用的今天，景观建设应该作出相应的体现。

中国地产发展已经呈现百花齐放的竞争局面，在市场激烈竞争的促进下必然会导致住宅产品的多样化，必然促使开发商追求产品的个性以区别其他，其中也不乏涉及到一些当代艺术的范畴，但我认为开发商的这个目的是积极的，但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几年前“新住宅运动”想把住宅融入到文化中，提到了德意志制造联盟、包豪斯运动，也提到了“诗意的栖居”，试图唤起行业的自觉。在大多数楼盘仍沉溺在欧陆风情里的同时，也有一些开发商开始接近当代文化、当代艺术，但社区的居民对于身边的当代艺术能否接受，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其实不管你作出什么样的景观，都是具有当代性的，因为是当代人的作品，关键是你反映的是什么样的理念和思考，“故弄玄虚”“无病呻吟”是大可不必的。

李存东：以最切实的方式与时代背景相契合

增加景观投入可以为开发商带来很好的商业回报，也可以使消费者的高投入预期得到满足。但这种投入并不是项目成功的通用法则，尤其在目前房地产业面临调整的时候，如何引导居住区景观设计，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与一些大型的地产商合作，并成为万科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通过几十个项目的实践，我认为当下居住区景观设计应该更多强调回归，回归到理性的消费投入上来，回归到以生态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趋势上来，回归到以艺术性提升居住品质的理念上来，以最切实的方式与时代背景相契合。

刘滨谊：本土化、地方化才是长久的潮流

本土化、地方化的艺术才是长久的潮流，一味“跟风”只会很快“落伍”；生态学的应用必须建立在对本土地方的深入了解与研究之上。生态更不能跟潮流，国际化热门的某种生态化处理方式并不一定能很好地解决本土的所有问题；可持续发展本身是个很宽泛的原则，过于宽泛的原则等于无原则，所以深入理解本土当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之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就可以算作成功的规划设计。

吴钢：景观设计首先是科学，其次才是艺术

房地产发展的目的是为居民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场所。景观设计也是同样目的，两者是不矛盾的。

在开发居住项目的时候，把景观放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去认识，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景观设计首先是科学，其次才是艺术。科学的基础是什么？是为人服务。所以我觉得景观设计的基础更多是生态学、地球地理学、气象学以及城市学。作为设计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关注的是这些人是不是生活的好，关注的是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客观的规律。而我们在学校里面一开始就学构成、平面，我觉得这个方法就错误了。因为景观设计不是基于这个理念，景观不需要被设计，景观本身就在那儿，你只是把它破坏了然后要去恢复它罢了。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设计仅停留在视觉美感的层面，而不去

研究人的生存环境，研究植被、湿地、沙漠，研究我们的江、河规律。这些要比视觉美感重要的多得多。

但开发商在进行居住环境的开发时，往往非常关注人的视觉愉悦，因为很多人有这种需求，当他们看到一个罗马式柱廊的时候，也许比看到一个蔷薇花还要兴奋。这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人这么去做、去迎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供需关系。在这里，对于设计师来讲，你去批评一种样式，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所以能够做的事情是改变一种需求，而不是一种样式，这就需要设计师耐心的引导和媒体的宣传教育。

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

您认为当代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刘滨谊：观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实现经济脱贫的情况下，再利用的需求绝对大于保护。既要可持续发展，也要“可持续保护”。一味保护只能是空谈，压制再利用会造成更大的社会矛盾。

刘伯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

城市的文化遗产就像我们家中那几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古董”，需要我们精心呵护。但现实让人非常伤心，我们对待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正像我们对待古董一样，弄虚作假者有之、坑蒙拐骗者有之、挖坟掘墓者有之……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这些遗产“一夜暴富”。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使我们面对遗产失去理智，不仅谈不上保护，实际上还在不断的破坏之中。尤其是对那些“善意”的破坏、“建设性”的破坏、景观的“美化”破坏，更要提高警惕。

王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这一类的工作叫做“遗产保护”。大家不认为它是我们生活当中还非常有价值的、可以继续正常生存下去的一部分，认为它已经不行了，不得不用所谓遗产保护的方式来解决。如果它有点儿商务价值还好，没有的话就非常被动、非常麻烦。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把原来居住的居民全部迁出，“遗产”能有活力吗？不可能有活力了。把居民迁出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这种地方它不适合居住了。这种判断的再一个前提就是，它认为这一类生活方式在今天这个社会，没有价值了。只不过大家都谈文化、谈传统、谈遗产，不保护的话好像是有问题了。现在最主要的动力无非就是旅游。当它只有旅游价值的时候，它就开始要没有生命力了。而且，国内旅游非常不成熟，基本上是猎奇性质，它和真正有人住在里面，游客非常感动想去看一看，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我刚才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这些东西是所谓的“历史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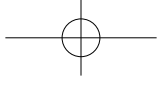
其实，这些东西是我们社会正常的、自我价值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面，老百姓在里面生活有特殊的价值，在当代生活中也是有价值的。

王向荣：没有积累

最大问题是我们把前人留下的遗存不当作遗产，任意铲除，用新设计与建造的“景观”替代；我们把周围的自然环境不当作自然，任意摧毁，用新设计与建造的“自然”替代。我们铲除、新建，再铲除、再新建，无论是自然还是文化，我们没有积累，我们正在逐步铲除这个国家的自然和文化的特征。

乔全生：遗产的定义和保护的手法

最大的问题是文化遗产的定义。中国目前还是把文化遗产定义为古董，保护文化遗产就是把古董修复好，放在古董的博物馆里。这样的心态与认识是需要改变的。我们怎样去定义文化遗产或者城市遗产。它不一定是以百年



为标尺，譬如说北京的798工厂，它是一个工业遗产，在过去完全没有被列入古迹的资格。它的出现标志着—个时代的演变，是一个重要的轨迹。

另外一点是保护的手法，如何进行再利用。社会缺乏对经济操作的理解，再利用只是一厢情愿地去再利用。将遗产再利用为美术馆或是咖啡厅，但是社会到底需要多少个美术馆，咖啡厅操作经营的过程是怎样的？应该有很多房地产知识和经济头脑引导，再利用才能使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发挥最大的效果。但是现在相关的知识技术还非常薄弱，大多数项目还是用较为浪漫的情绪进行保护，并没有从更深刻的、经济的观念或者社会学的观念来进行保护和再开发。

王辉：科学是一切事情的基础

遗产保护是一门科学，必须要有一定的科技手段，否则的话谈不上保护。首先是城市规划中的产业布局，再者是城市经营管理，没有规划的科学性、没有技术的科学性，遗产是不可能保护得住的。像故宫，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保护故宫，假如没有合适的消防手段，那些东西都很脆弱。遗产保护得好不好，肯定有法律来限定，但是没有科技手段，其他的就谈不上，一定要有实实在在的科学基础设施。

李存东：遗产保护与城市开发建设的矛盾

当代遗产保护与再利用中，值得关注的是遗产保护与城市开发建设的矛盾问题。目前我国遗产保护正处在一个社会经济大发展的进程中，城市的建设发展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对遗产保护带来冲击。在国家对遗产保护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遗产往往被动地暴露在城市开发建设区域中，形成尴尬的局面。国家已认定的遗产尚且如此，更多不受保护的历史遗存往往只有一个归宿，就是被经济发展的大潮所吞没。作为设计师，应该有遗产保护的意识并在具体项目中身体力行地将之付诸实践，为社会文化的传承作出努力。

张轲：保护和开发的平衡

首先，保护和开发的平衡问题。我们回国以后，接触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东便门城墙遗址公园。当时和我们竞争的很多家都是做激光城墙、水城墙、玻璃城墙、钢板城墙的。实际上，我们是唯一不对城墙进行修饰和改造的方案。如果它是一个遗产的话，它的存在就是最主要的问题。所以首先应该解决遗产的保护利用问题，其次是交通组织，最后是提供公共空间、景观设计。

其次，在实际操作层面，如果把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方案运作简单地让开发商去做的话，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因为，经济资金的收支平衡问题是没有人能够逾越的。古巴有一个方法可以值得借鉴，他们的遗产保护开发资金是通过发行彩票筹集的。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城墙需要保护，但又不希望开发商利用此来赚钱，就可以去买这个彩票，实际上就是集资，然后政府再投资一半，启动资金进去以后，就可以清理遗产和完善周边环境。建成后的旅游收入用来保护和维护遗产区域。这些只需要政府配合一个小的政策。

庞伟：“利益原则是第一原则”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中国文化中是天经地义的事。13亿人梦想和致力于富裕，大家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寻找资源为我所用，这就是最真实的现实。利益原则是第一原则。如果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符合我们今天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不用操心人们的破坏。如果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不符合当事人的利益；符合明天后天的利益，而不符合今天的利益，都不能指望人们会信服。当下的中国人民是全球最现实的群类，这不是毛时代，理想和信条不能成为行事依据。

吕斌：旅游门票不能反映遗产价值

最近几年，我觉得已经有了很好的保护遗产的意识了。做景观设计的

时候，也一定会遇到这一类问题，从对那些大的遗产，比如长城、运河，到一个文物，一个古城，一个遗址，甚至是近现代的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都有了文化的需求。作为一个民族来说，遗产作为集体的记忆来保护非常重要。

集体的记忆需要符号，并且这种符号很多是沉淀在遗址、遗产和建筑中得以留存下来，它的经济价值并不是都由旅游能卖多少钱的门票来反映的。近年来，对那些等级很高的遗产，无论从法律法规，还是人们的认识来讲，都还是得到了重视的，或者说人们不得不重视它。这里说的等级高的遗产，主要是指世界遗产或国家级的遗产，包括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对这种遗产或遗产地的保护应该是毫不含糊，没有犹豫的余地。另一方面，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其实是对那些等级不太高的，包括一些工业遗产和遗产地的保护，比如厂房、高炉、矿井、矿坑等，我们一定要珍视它、珍惜它。像俞孔坚老师做的一些乡土文化遗产、民俗民居等保护项目的理念和手法，我就非常赞同，它是人地关系的思想和实践的积累，这也是一种文化观，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要重视。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一个民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它也需要一些空间的载体和一些生存的环境才能够得以延续和传承。

李建伟：国家文物保护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没有力度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对文物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虽然我们设有文物保护局，但限于它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权力，它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更大面积的文化与自然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国家也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负责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比如美国就设有Natural Resource Department（自然资源部），专门管理自然资源。国家的水体、湿地都受到良好的保护，而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的自然资源还隶属于林业局等，国家林业局不同于之前的国家林业部，已经降格级了。在美国，如果一个小区里有一个湖，湖边的房子要比不临湖的贵3倍，这就说明他们对资源特别重视，只要发现好的资源，就会好好地加以利用。而目前我们国家很多城市的自然资源都没有了，尽管现在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但我认为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多么重要都不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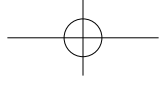
文物部门能够保护起来的文化资源也仅限于那些被评上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特别是北京地区的文化遗产能够受到格外的重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物疏于管理遭到严重的破坏，在经费上还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我前不久去小城丰都，鬼城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古老的建筑，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就因为管理的不好，修缮人员甚至都不知道怎么修，因此就变成了一个四不像。实际上文物保护部门是没有能力来做这些事情的，这才是问题所在。

俞孔坚：中国的管理体制

最大问题是中国的管理体制问题。自然和文化遗产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资源、公共财产。但属于国家的公共财产又被委托地方管理，变成了地方的盈利手段。圆明园就是一个例子，它自己的管委会就可以决定建与不建，谁都干涉不了。这跟美国很大不同，美国公共资源是国家管，但中国国家的资源已经被下放到街道。街道办事处反而要向全国人民收门票，变成了牟利的手段和工具。这是存在的最大问题。其他次要的包括管理法规不健全、执行不到位、认识不足等。

马晓晖：所有权问题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遗产保护并不是一个愿意保护还是不愿意保护的问题。坦率地讲，我认为中国的遗产保护最大的问题是所有权问题。当剥夺了人对一个物质遗产所有权的时候，保护就无从谈起。我们今天为什么跑到威尼斯、罗马去观光游览？因为这些地方保护得非常好，它们除了法律健全之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被私人拥有的领地。私人不但拥有，还



生活在里边，是个“真实的”城市。在中国，一个四合院本来住了一户人家，结果变成大杂院，变成大杂院的过程就是剥夺所有权的过程。那么现在如果想保护它，首先就要从产权上重新界定清楚，同时让它回归到原来的密度，原来的收入结构，原来的味道，随之而来的也就会引发出相应的例如配套服务业这样的需求。这样，城市的氛围在改变，而这种改变不是纯粹的政府行为。所以遗产保护和旧城改造，不应是政府大包大揽、大拆大建、把老百姓赶走，然后政府进行商业开发的一个过程，不能够建立在剥夺人们居住权的基础之上。一个健康的城市，人是一定会住在里边的。剥夺了居住权的话，就只留下一个空壳。如果我们再赋予这个空壳一个纯商业的内核，就完全变成了为游客的需求而设的一个商业游览地，周庄不就是一个例子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待遗产保护，恐怕还是要理清楚它的所有权。以前苏州曾经提出过，大量的私家园林可以被私家拥有，政府放弃大包大揽的过程，允许私人去购买，但是私人购买之后一定要养护，不能私搭乱建，政府建立档案，我觉得这种思路还是对的。这就是说，应该重新引入社会精英群体，来变成居住的主体。否则的话，如果我们的遗产保护太注重古迹的外壳、把心给掏空了的话，这种缺乏心脏的外壳就变成了木乃伊。

同时，遗产保护这一块，要给社会一种信心。因为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所有权是一个很容易被撼动的过程，他是不会把自己的身心放进去的。所以我们中国今天为什么遗产保护它是虚假的？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当你剥夺了对资产的所有权之后，他不敢把自己的身心都放进去。但是如果这个地方属于他，他就会想到传给他的后代，就会有长远的打算。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私产一个安全感。我们看欧洲那些老店，比如巴黎的面包房，20年以前去是面包房，今天去仍然是面包房。在北京，我想问问您，有哪一个店10年以前您去过，今天还是那家店？基本上都搬掉了。做好它也搬，做不好它也搬。如果这个店今天是干这个的，两年以后又干那个去了，那我们谈什么保护？我们连今天的业态都不能够稳固下来，还谈什么遗产呢？遗产是100、200年才叫遗产。如果这个东西只存在两三年，那叫遗产？

所以，在保护私有财产的背景下，遗产保护可能会出现一些改观。在上海我住在老城区，我能感觉到城市密度、人口结构的改变。我认为建立在人口结构改变上的遗产保护，才是真正的遗产保护。我认为政府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允许市场介入，让经济规律发生作用。不要过多的干涉，也不应该大包大揽。

在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中，景观设计师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您是如何处理这个挑战的？

王向荣：转变观念

最大挑战是观念，是深藏于许多人心中的很难改变的观念，那就是我们只将文物当做遗产，只将天然当作自然。景观设计师首先要自己转变观念。遗产包括地球上天然形成的地表物（自然景观）以及附加在这些地表物上的人类活动的形态（文化景观）。景观设计是一种职业，是保护、管理自然景观，保护、管理、恢复、改造、创造文化景观，并使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和谐共生的职业。

在我们的实践中，新的景观的建立从来不会抹杀原有景观的所有痕迹，我们追求“在自然上创造自然”，把大地肌理的保留、景观的积累作为一种历史的延续和新景观产生的基础，这是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的核心。

庞伟：你想清楚了没有？

保护遗产和再利用中，设计师最大的问题是你想清楚了没有。真的保护了吗？所谓再利用是不是一种破坏？还是以保护为名、索取更大利益为实？我要做的事是逼自己尽量想清楚。

王辉：价值观

都市实践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坚持发展自己的价值观，这是都市实践最大的特点。假如说我们跟别家设计公司有什么差别的话，就在这儿。我们相信能用现代设计去解决当代问题，当代问题也只有通过当代设计来理解。现代设计手段、现代设计语言，有非常非常强的包容性，它可以把历史遗产很好地修饰起来，或是转化、或是融合。如果把景观理解成配景的话，历史文化在现代景观的映衬下，依然可以熠熠生辉，而且可以更完美地镶嵌到现代生活中。

李建伟：怎样去认识文物、认识自然资源

最大的挑战是怎样去认识文物、认识自然资源。另外，努力提高公众的认识，包括各级领导、当地居民和开发商，这也是景观设计师需要做的。再次，如何把文物保护与再利用结合起来。如果保护只限于纸上空谈，没有切实的经济扶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有很大困难的。实现遗产的再利用也不单单只是要靠文物挣钱，有时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比如丰都，我们提出怎样利用文物古迹为游客服务，怎样实现运营、改善管理，这也是保护它的一个手段。对于我们周围的设计师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通过你的设计将文物保护下来，然后为今天的人们所用。

王澍：意识，教育

首先，需要从思想观念上有一个大的遗产中还在发生变化的意识，其次，还需要发挥教育的作用。对于景观设计师来说，要有遗产保护的意识，对生活抱正面的态度，不要去做美化性设计。体会到这种生活方式有自己的价值，然后用非常小心的、不要过多干涉的方式去接触它，最后逐渐地探索解决的方式。

刘滨谊：如何权衡需求与利益

如何权衡当地的经济发展需求与长远环境利益的冲突。处理这个挑战的方法只能是抓主要矛盾。

李存东：保护与商业开发互相促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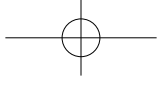
景观设计师在处理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问题上，必须在经济利益与遗产保护产生矛盾时，作出正确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一边是付给我们设计费的业主，一边是行将破坏的遗产，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提出最优的解决方案用以平衡二者的矛盾，要么坚持自己的职业选择。在我们设计的布达拉宫周边环境整治、无锡鸿山遗址公园、西单民族大世界、南堂教堂广场等涉及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案例中，大多数情况下，业主都能接受我们的合理建议，并认可遗产保护与商业开发互相促进的景观方案。

刘伯英：注重非物质设计

在遗产保护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建筑等物质本身，还要注重工作场景、景观氛围、文化品质等非物质的东西，也就是景观的东西。因此这给我们的景观设计师非常大的挑战，您不能只会做居住区景观、广场景观，还要会做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景观、工业遗产保护的景观还有自然风景区的景观，无论是景观的尺度，还是景观的内涵都有巨大的差别。实际上就像建筑设计一样，在专业上分得越来越细，需要考虑的东西越来越丰富，这对景观设计的教育和实践，对从事景观设计的设计者来说都提出了挑战，就是给你这样的项目，你会不会做？能不能做好？我觉得目前来看，还很不够，差得还很远。

乔全生：寻找新的设计元素

最大的挑战是在保护的过程中找到新的设计元素。要从设计的手法谈起，以现代对比传统？还是用传统来强化它本身的风格？还是在现代和传



统之间，找到另外相得益彰的语言？这与设计师的成熟度、敏感度、经验关系密切。

处理这个挑战的关键是与遗产保护的甲方做很好的沟通，了解保护的目
的、功能，找到真正的内容，机能上的内容。也许是商业目的，也许是文化
或教育目的，也许是纯粹的历史保护、古迹保护，这会有不同的处理手法。
在西方有一个专业叫做Cultural Landscape（文化地迹），是一个很专门的
学科，现在中国还没有。这个学科有很多遗址的景观处理手法，从历史的角
度要找到大量全面的资料，恢复遗址的历史景观风貌。这其中包括植栽和处
理手法。这就与再使用、商业使用的手法未必完全一样。而在国内，历史景
观的处理和保护再利用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行业。

马晓晖：像对待古建一样对待我们现代的景观设计

国家比较重视保护建筑，至少是建筑外壳的保护，但是我们什么时候
保护、保持过一个景观？如果我们去上海的复兴公园，你能保证看到那个水
池，是从它100年以前建的时候就存在吗？还是在10年以前改动过？我们对
园林和景观的保护意识是非常差的。我们认为建筑不能动，建筑可以挂铜
牌，但是我们什么时候给公园挂铜牌？我们什么时候说公园的水池不能改？
假如水池是公园遗迹的一部分，那么即使修也要用老材料修旧如旧，但我们
没有这种规定。我们随意替换里边景观的配饰物，随意修改里边的景观元
素。甚至于在中国，刚刚建了5年的公园就被推倒重新做了。所以当个园
林在中国只生存5到10年的时候，这难道不是很可悲吗？所以我觉得景观的
保护，不但要谈古代的，也应该谈近现代的保护。否则的话，我们的智慧，
我们一个时代的符号就被抹掉了。我们现在很难看到60年以前的公园了，它
不断地在修改，不断地在翻建，不断地在增加新的内容，结果我们看到的东
西，永远都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东西。就好像一个建筑外立面不断地在改，
到时候改成了四不像。我也不希望作为设计师，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反过来
看，大部分自己的项目都被拆掉重盖。所以，我们如果保留不了我们老一辈
设计师的作品，我们这些人的作品也会在很短时间内被拆掉。这也是对社会
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西方，很多公园存在了50、100年了，它依然存在。中央公园基本上
没改过。设计的时候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只是树长大了而已。所以
纽约很有延续感，人也会对那个地方产生感情。人很多美好的记忆是在公园
里边发生的，当这些地方被改建了之后，就抹掉了人跟它们的亲近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从任何意义上讲，我们都应该像对待古建筑一样，来对待我们
的景观设计作品。

**10年中，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理念已经在近逐渐被中国社会接受并认
可，您认为怎样才能更好的消化工业遗产留给我们的精髓？**

刘伯英：败家子儿不能当

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已经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工业遗产也是遗
产，只是这件“古董”年头没那么长，但对城市来说与文物相比，价值是不
一样的。工业遗产的保护就是保护了城市的特色风貌，保留了城市发展的
历史，它是几代人艰苦奋斗的物质载体和精神寄托。工业遗产是历史留给
我们的财富，我们千万不能当败家子儿，把这些遗产当成“破烂”给扔了、
毁了。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景观设计也是大有可为，从德国鲁尔工业遗产再
利用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可以借鉴的地方，中山岐江公园已经做出
了榜样。景观设计就是要抓住一切机会，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社
会的需要。

王澍：要认识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好的城市

这些年大家开始重视工业遗产保护，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开始意识到不

光只有传统的东西是城市的遗产，工业遗产也是遗产的一部分，这是较成熟
的表现。但我们看待这类问题都还是比较孤立的。只有大家认识到什么样的
城市才是好城市的时候，遗产保护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否则现在这种工业
遗产，难免变成某个地方的文化作秀场所。

张轲：克制设计师的自我表现

工业遗产保护内容通常很模糊，不像城墙、鼓楼这些已经化为文物的遗
产。在工业遗产更新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克制设计师的内在自我表
现欲，因为工业遗产被重新设计再利用的自由度比一般的文物更大，它可能
并不属于历史叙事的主线，有很多价值不仅仅是挖掘，而应该是再创造，设
计师有更多的创造空间可以去自由发挥。所以设计师一定要看清楚，什么时
候克制自己，什么时候发挥自己。

庞伟：不能模式化、翻版化

工业遗产在若干年前就没有当成文化遗产，现在好一些，但这事的关键
在于有一些工业遗产重在保护，而更多的工业遗产重在利用。如何把它再利
用起来与今天的社会交融，成为今天城市的魅力组成是最需要考虑的。这需
要更多的创造和工作，不能模式化、翻版化。

刘滨谊：走“可持续保护”之路

可持续保护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对历史人文意义的借鉴缅怀，也要不损
害后代人物质经济发展的需求；既要为过往的历史留出空间，也要为今后的
人文发展留足空间，才能真正达到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马晓晖：赋予使用功能

坦率地讲，工业遗产当然有它一些正面的作用，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做法
大部分是在作秀。大部分是给机器上点颜色，摆在那个地方让人看看，这个
地方曾经是个工厂，这太简单、太直白、太符号化了，有点像舞台布景的感
觉。第一次做，大家觉得很新鲜，但是做多了以后大家就没有新鲜感了。
烟囱保留下来，有多少居民会整天看着烟囱就觉得很美？当一个烟囱被保
留下来的时候，它是个性格，但是一个城市保留10个烟囱的时候就不再是
性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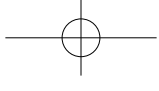
我觉得对工业遗产的保护，还是要赋予它使用功能，比方说一个老厂房
被改造成餐厅，我觉得就够了。它是一种真正有血有肉的延续。延续老的构
架，就不用再去使用更多的新材料了，这也是对环境的一种保护。

李存东：引入合适的使用功能

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是城市发展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应该
有这样的意识：历史不是断代的而是延续的，我们对遗产的尊重就是对自己
这个年代智慧的尊重。工业遗产的存在是上个时代工业化进程的见证，虽然
它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它仍然能有效承载现代生活。对工业遗产的保
护和再利用，除了原址保护等措施外，更应关注如何引入合适的使用功能，
使之符合工业遗产的空间氛围并为地区和城市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李建伟：重拾生气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上海黄浦江边徐慧区项目就是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
用的实例。项目在世博园的对面，是一个几公里长的滨江工业带。工业遗产
既是产业现状，也是产业历史，更是一种文化激励。工业遗产除了具备历史
价值，也兼备景观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些因素必须加以利用。工业设施迁走
后，过去的那种生活、景观已经不能为今天所用，我们通过注入新的生活，
使它重具活力，能够为现在、将来更好的服务；重拾生气，能够融入今天新
的生活空间。比如以前的那些废弃的工厂、码头，就可以把它变成居住区、
城市广场，也可以是一个公园、商业区、艺术区，像798工厂。这个过程实



际上就是转型。事物都有很多的层次，在保留本身特质的同时也能够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要。

我提倡所谓的生活景观，就是把能够代表当地人们每天生活的、简单的、朴素的元素当成景观来看，从这些元素中挖掘出艺术感染力。工业景观就是属于这一种，我们把过去的生活融汇到今天的生活里面，从而产生出充满活力的新景观。历史总是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打上烙印，城市也是一样，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王辉：消费工业遗产

工业遗产在造型、艺术上实际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它只是具有时代性。中国每10年都有它的特色遗产，50年代有、60年代有，文化大革命年代有，到现在也有。工业遗产的时代性就是鲜明地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而已。

都市实践早在1999年的时候就设计了一个京东方，那是比798还早的一个工业区，但可惜业主并没有前瞻性，所以项目没有做成。这次奥运会对北京的宣传，798工厂已经跟故宫在同一个宣传平台上了，那就说明798工厂的形象，基本上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正统。这样，工业遗产保护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

历史遗迹在结构依然可用的情况下被再利用，同时被时尚性地夸张，形成了城市的一道风景线，有很高的人气，这是好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现在，经常看到一种见厂房就保、见厂房就改，到处是创意产业，处处是过分做作的趋势。这个趋势只会导致我们所谓的工业遗产快速地堕落，使很多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变成当代资本主义利用的工具。所以，应该有批判的警惕性。中国现在城市化跟过去本质的区别是工业城市转变成成为消费城市。实质上，我们是在消费主义的新旗帜下去消费工业遗产，而不是保护工业遗产。这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如果不用消费的方式，还有什么其他保护方式吗？回答几乎是没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

陈跃中：“享受”遗产

我们的文化传统非常深厚，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遗产，不管是文化遗产还是工业遗产，跟我们怎样看待主流社会有关。设计领域无非就是反映这样一个价值观。对于遗产方面，我觉得景观设计责无旁贷。第一应该加以保护，第二要和景观相结合，第三加以利用，使它变得有价值，不成为城市经营者的负担。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的发展，尤其是现在进入了服务型、消费型的社会，这些都变成独特的一些人文景观，那必然应该与使用相结合。以前我们对于所谓遗产的保护，对于文化的看待，过于严肃了。包括举办北京奥运会这件事，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大派对、狂欢的节日，应该鼓励市民在街上边看礼花、边吃冰淇淋、边喝啤酒。我们却认为啤酒摊、水果摊影响市容，就全撤了，到那除了看到“奥运”这样一个干干净净的东西以外，连一个冰淇淋都买不到，好像拿肥皂洗过的一个东西一样，一点尘埃都没有，它也就没有趣味了。

以后景观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越来越让人享受，包括工业遗产在内的商业配套、服务设施都是景观的一部分。景观规划设计本身解决的就是关于这些小卖部、服务站之类怎么布局，而不是由别人设定好这些功能，剩下种花、种草的工作才叫景观设计，应该大景观，包含了功能配备、功能布局的。遗产也是一样，强调使用、强调和某种消费功能结合在一起，这绝不是实用主义的观点，它绝对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观点。就是要消费它、使用它，并不是把它磨损掉，而是把它变成日常享受的一部分。

乔全生：综合考虑项目特征、本质和目的，找到平衡点

工业遗产保护最后保护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是再利用？还是你要盖一个工业美术博物馆？还是盖一个工业历史博物馆？还是要把这个工业——比如

说把798工厂盖成一个文化活动的设施？大家都会用的就是用很多原来工业的零件放在场地上面，比如一个马达、一块铸铁，但我认为那是一种装饰性行为。天津的万科水晶城将原来一个玻璃厂房改建为住宅，然后把原来的厂房（包括老旧的轨道）变成会所。这个处理的手法很好，保护的同时可以去发挥，在不同的场所中运用不同的处理手法。每一个项目保留的强度可能不一样，或许是点缀性的、装饰性的，或许表达了深刻内涵和意义，又或许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机能、地理环境、文化诉求不一样，它背景的诉求可能就不一样。用我们现在做的重庆重钢规划举例。重钢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的重金属工业，比如武器，曾经有过很重要的职责和任务。今天再使用和再利用时，怎样把它曾经有过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在设计中原原本本、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的同时，还要满足现在一些新的机能的需求？也许它的商业业态和教育意义没有达到平衡点，是不是应该强化商业？它的教育或历史文化的任务是不是被抹杀了？或者完全以历史文化任务为出发点，但它的商业可能就不那么成功。

考虑每一个项目的特征、本质和目的，在可利用的素材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烧出一盘非常美味可口的菜肴。

吕斌：呼唤共识的标准出台

当前我们国家现在处于一个工业转型时期，我觉得工业遗产的保护有许多问题非常紧迫，需要我们思考 and 对应。对于工业遗产文化价值的评价，大家的认识很模糊，没有具有共识性的统一标准，并且保护也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主要是靠专家的评价和建议，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我认为当前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急需做的事情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判定工业遗产价值的标准，包括文化价值、美学价值，还有它本身是否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某一里程碑的意义，即史学价值等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要有一个共识。这方面需要把现在有的一些好的做法赶快归纳总结一下，这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朱育帆：设计师的持续努力

中国社会现在对于年代比较久远的遗产，即所谓的历史遗迹文物等基本上都能够持一个保护的态度，只是利益的冲突而没有观念上的疑义；而对于历史较短的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工业遗产，各方思想冲突还是很大的。比如很多老的工业遗产区随着城市的拓展渐渐成为城市的中心地带，保护利用还是拆除？这需要城市经济发展利益的权衡，按照现行做法，结果一般都是拆掉。而且，就一般社会层面而言，这种工业遗产究竟有多大保护价值在中国各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我们的思考是，对待工业遗存，完全抹去过去是否还有最好的做法，是否可以采用新旧并置的方式，这里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即对于工业遗存作为存在的思考。在这方面，艺术家和设计师有引导大众审美的义务和责任。

对待工业遗产，西方设计思潮也是经历了相同的从忽视到珍重的发展过程，当今世界无论艺术界规划界还是设计界，一种趋同的观念是将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和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起来。美国西雅图油库公园（Gas Works park）就很经典，它通过景观设计的方式唤醒了民众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德国设计师彼得·拉茨（Peter Latz）主持设计的鲁尔工业园区改造更是成为将遗产融入城市生活的典型代表。一个唤醒，一个融入，西方已经慢慢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对待工业遗产的保护机制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普遍认知。

在中国，随着新观念的引入，当前的工业遗产保护更像是一个潮流，还没有在社会层面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意识本能，或者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现在很多工业遗产的保护项目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方案的阶段，实现的很少。

所以，设计师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专业的探索启发民众对于这种美的认识和接受，这种努力无在乎大小，也不在乎速度快慢，而在持续。■